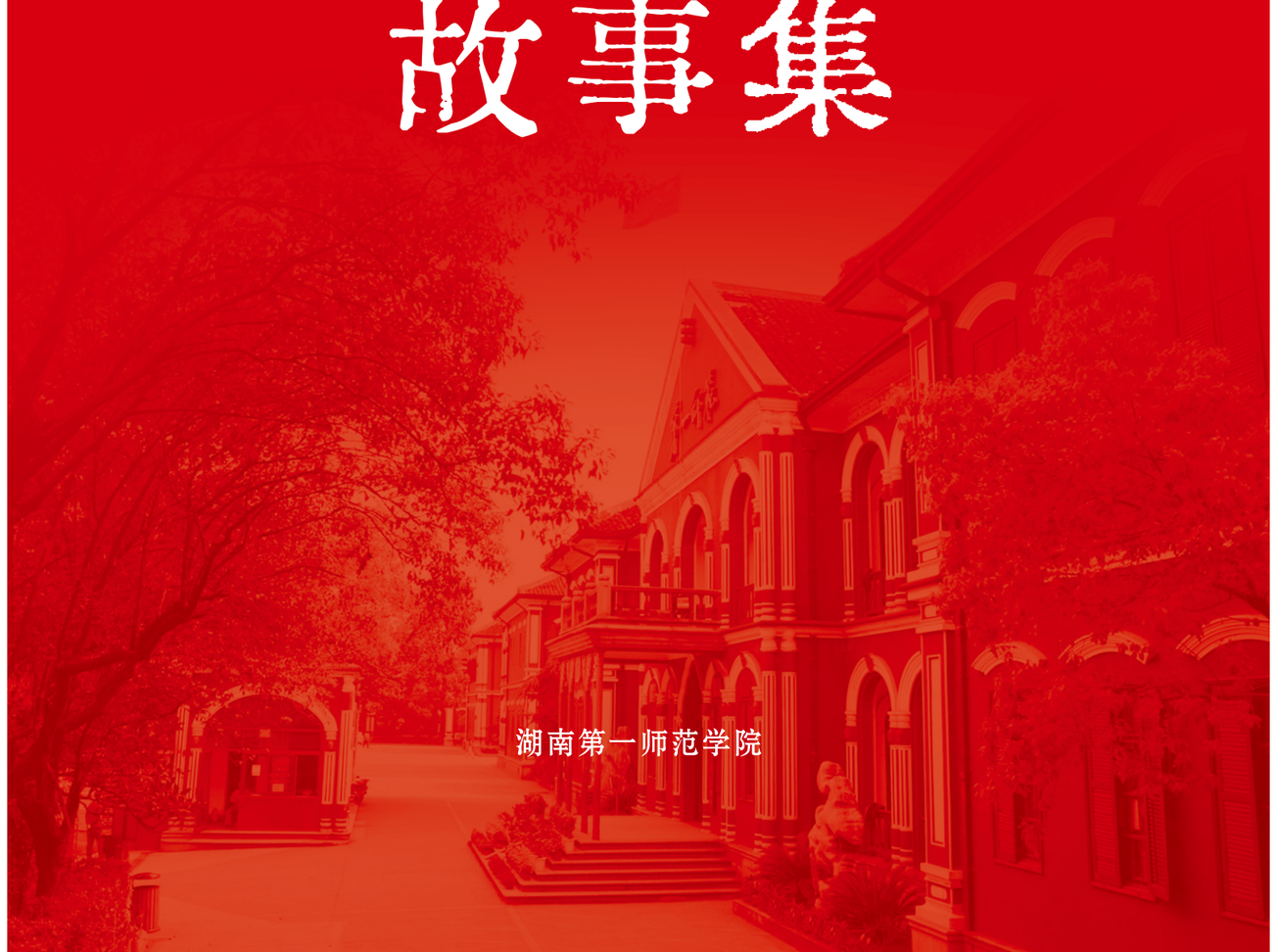
第一師範
HUNAN FIRST NORMAL UNIVERSITY

红色一师

HONGSEYISHIGUSHIJI

故事集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大先生”篇】

“九哥”王季范.....29
“开国元勋，统战先驱”——李维汉.....30
“是丐尊，不是丐尊”——民国大家夏丐尊.....31
“苏区包公”何叔衡的“纪律建设”.....32
“我不是天才，我本想当教书先生”.....33
“湘中作家”——黎锦明.....34
甘做“焦官”的谢觉哉.....35
吃水不忘挖井人.....36
春风化雨 润物无声——“民主教育先驱”孔昭绶.....37
觉醒者的响铃交响乐——易白沙.....38
匡互生：怒火焚烧惩国贼 革故鼎新育英才.....39
李达：一大的召集人 理论界的鲁迅.....40
力食居背后的师生情——毛泽东与历史老师罗元鲲.....41
烈士彭道良：教育改革先行者.....42
舒新城.....43
岁月变迁，丹心永继——毛泽东的秘书李六如.....44
田汉：以笔为枪 为国而歌.....45
为党献身，死而无憾——陈昌.....46
伟人恩师杨昌济.....47
杨树达.....48
一代语言文字宗师——黎锦熙.....49
故宫博物院首任院长——易培基.....50
营财不为身的“熊老板”——熊瑾玎.....51
永远的先生——徐特立.....52
袁吉六.....53
张干.....54
知人善教的好老师——王立庵.....55
周谷城.....56

“九哥”王季范

1952年春节，毛主席在中南海丰泽园设宴招待来自湖南老家的客人。宴会前，他拉着一位老人的手，向客人介绍说：“这是我的九哥。他住在湖南十四都，是我的姨表兄。”然后，毛主席又接着说：“没有他，就没有我。”毛主席口中的“九哥”，就是他的姨表兄王季范。

王季范，原名邦模，1884年生于湘乡，著名民主教育家。因父亲做过官，家里还算富足。王季范的母亲是毛主席母亲文七妹的姐姐，也就是毛主席的二姨。王季范比毛主席大9岁，在同辈兄弟中排行第九，所以毛主席称他为“九哥”。

毛主席小时候常常住在外婆家，在这里认识了他的姨表兄王季范，好学的毛主席经常向表兄请教学问，王季范也非常喜欢这位表弟。

1910年，正准备听从父亲安排到米店当学徒的毛主席，听到表兄文运昌关于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讲授新学的消息，便向父亲提出要去读书的要求，却遭到父亲的反对。16岁的毛主席便请来亲朋好友替他说情，当时的王季范正在长沙读书，很有见识，他劝说姨父毛顺生说：“不读书就没有用。”，他的这一句话胜过一千句话。再加上其他亲友的劝说，毛顺生终于同意了儿子的要求。

1911年，王季范已从长沙优级师范毕业，也就是现在的湖南大学前身，他来到湖南第一师范担任数学教员。

这年春天，毛主席离开湘乡，跟随老师贺姓老师来到长沙，先到驻省中学读书，又到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湖南省立第一中学，后又经过自学，再次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第四师范，在这期间，毛主席也是受到了表兄王季范的照顾和帮助。

1913年春，当王季范得知毛主席已被第四师范录取，又听校长说：“我看了毛泽东的作文试卷后敬佩不已，这样的文章，我辈同事中有几个做得出来？因此将其名字列于榜首。”王季范非常高兴，他当即找人把这个好消息转告毛主席，并向他表示祝贺。

1914年春，湖南第一师范与湖南第四师范合并，毛主席转入一师读书，被编入一师八班，而他的老师之一就是表兄王季范。从此他们之间不仅是亲戚关系，更是师生关系。

毛主席在一师求学时，收到了王季范经济、学习资料等多方面的帮助，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在驱张运动后帮助毛泽东。当时的中国战乱频发，财政枯竭，1915年6月在湖南省军阀汤乡铭的授意下，湖南省议会要求长沙各师范学校每个学生要缴纳10元学杂费。10块钱在当时不是一笔小数目，这立刻在广大学子中引起了强烈的不满，毕竟许多人就是付不起学费才报考师范学校的。尤其是时任一师校长张干为人古板守旧，用各种严格的制度限制学生的思想。学生们都敬重原来的校长孔昭绶，对张干的行为十分反感。这也导致毛泽东等学生都认为是张干为讨好汤某人，故意赞成收费。于是广大学生迅速行动起来罢课，演变成了轰轰烈烈的“驱张运动”。但毛泽东看了大家到处散发的《驱张宣言》后，立即找到同班同学周世钊。他说：“这里面讲的都是张干的私德如何‘不仁、不义’等等，没说到关键地方。我们反对他做校长，既要赶走他就要批评他如何办学不好。我们重写一个宣言如何？”周世钊点头称好，于是毛泽东很快写出四千多字的新《驱张宣言》。这份新的宣言怒斥张干如何对上逢迎，对下专横，办学无方，贻害青年。

随即同学们连夜赶印上千份，次日清晨开始广为散发。然而却有一个学监发现了学生的动作，将毛泽东带头的事密告了张干。学生要公然赶走校长，这简直是天下奇闻。

张干自然不会坐以待毙，很快贴出告示要开除以毛泽东为首的17名学生。王季范听到毛泽东等学生要被开除，顿时忧心忡忡。他对家人说：“张干做得太过分了！这批学子志向高远，抱负不凡；我必须出面替他们主持公道。”他马上到了杨昌济家，和杨昌济一起商量对策。王季范说：“《驱张宣言》中列举的事实不无道理，张干怎么能因此就开除学生呢？”

杨昌济连连点头，说：“像毛泽东这样的优等学生也能被开除，学校还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两人商议后决定联合全校教员，与张干斗争到底。于是王季范又联络了徐特立、方维夏等教师，第二天就召开了全校教职员工会议。在会议上王季范和杨昌济等人坚决维护学生的合理权益，对张干的行为进行了严厉批评。

张干此时成了孤家寡人，只好打消了开除毛泽东的念头后并离开了第一师范。

这是毛泽东命运的重要转折点，他能够顺利完成学业并成长为革命领导者，王季范可以说功不可没。不过张干当年也是情非得已，王季范等教师后来才明白他的苦

心。所以1951年毛泽东还专门请晚年的张干到北京，对其当初的冲动表示歉意。

新中国成立以后，王季范被聘为政务院参事，迁居北京。他关心党和国家，关心人民群众，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特别是经常回到湖南访贫问苦，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了解群众的真实意见，及时向党中央、国务院甚至毛主席反映，在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发挥了很好的桥梁作用。

1972年7月，王季范在北京因病逝世，享年87岁。国务院参事室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毛主席亲自为他敬献花圈，在花圈的飘带上写着：九哥千古，毛泽东敬挽。这饱含党和政府对这位伟大的教育家的深切悼念。

“开国元勋，统战先驱”——李维汉

在我们第一师范校园的体育场前，矗立着一尊巨型青年毛泽东铜像。这尊铜像是学校为纪念伟大校友毛泽东主席诞辰100周年而建造的。

麻白色石块的铜像基座，正面镌刻着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主席亲笔题写的“青年毛泽东”5个金色大字，基座后面则镌刻着一篇题为《毛泽东在第一师范》的铭文，言简意赅地概述了毛泽东主席在一师八年间学习和革命的经历，是我们读懂这尊青年毛泽东铜像深刻寓意的钥匙。铭文末尾落笔署名李维汉。为什么李维汉要为学校的这尊铜像撰写铭文？他与第一师范、与毛泽东又有着怎样的渊源呢？

李维汉，原名罗迈，1896年6月2日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县高桥乡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的统一战线方面的著名理论家、卓越领导人，被誉为“开国元勋、统战先驱”。追寻李老的一生，他的崇高精神和伟大风范，哺育和感召着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

1916年8月，李维汉考入湖南第一师范本科第2部1班，1917年7月毕业。毕业后至1918年，李维汉来到一师附小参加了工作，任初级部主任。也就在第一师范求学、工作的岁月里，他结实了毛泽东、何叔衡、蔡和森等一大批有志青年。他们经常在校园里讨论时事、切磋学问，特别是关心国家与民族命运这样大事。1918年4月，毛泽东、蔡和森组建新民学会，李维汉成为第一批会员。

此时，已经来到五四运动爆发的前夜。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1918年6月，新民学会在附小召开会议，确定了“国外发展”、“国内研究”同时进行的发展战略。李维汉选择赴法勤工俭学，一边做工，一边读书，努力寻求改造中国的途径和办法。1918 年 8 月 15 日，李维汉与萧子升、李富春、等 24 湖南青年，在毛泽东的带领下，从长沙的湘江东岸登船来到北京，开始为留法学习做准备。

最难的要算筹措学费。李维汉家境贫寒，因此他四处奔波，在家乡的族中祠堂得到 30 元、一个远房族兄借给他 10 元、第一师范的老师资助他 100 元……为了解决出国穿的服装，易培基老师拿出一张名画送给他和张昆弟，介绍他们到上海典卖50元……李维汉还申请地方政府给予求学补助。虽然“身无分文”，却“心忧天下”，李维汉始终没有放弃求索的选择。终于，1919年他登上去远赴法国的邮轮。然而到达法国后生活异常艰辛。李维汉后来回忆初到法国时的情景说，为了节约开支，郭春涛

和他两人商量合用一张床，这样可以节省出一张床的住宿费；他们轮流睡觉，一个人白天睡、晚上去打工，另一个人白天打工、晚上睡。若干年后，李维汉见着郭春涛之子郭志坚，说：“在法国，我好长时间和你爸爸‘同床’，一个白天睡，一个晚上睡，我们感情很深的哩!”留法期间，李维汉接受并信仰马克思主义。1922年，他同赵世炎、周恩来等同志一道组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并负责组织工作。同年，受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委托，回国申请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底，由毛泽东、蔡和森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此后，他一生都追随毛主席，经历了建党以来的整个过程，先后担任过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共陕甘省委书记、中央党校校长等重要职务。

1948年至1964年底，李维汉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他善于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提出适合国情的理论观点和政策原则。1950年，他主持制定《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筹办中央民族学院试行方案》，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有力推动了民族地区各项事业的发展。1951年，他作为中央人民政府首席全权代表，负责同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谈判西藏和平解放问题，达成《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对祖国统一大业作出了重大贡献。1952年，他在总结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经验的基础上，主持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成为我国第一部关于民族问题的立法，为党和国家的统战、民族、宗教工作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作出了卓越贡献。

作为建党时期的老党员，李维汉经历了革命、建设、改革多个历史阶段。但无论遇到什么风浪，他始终信念坚定，对党和国家绝对忠诚；一生兢兢业业、恪尽职守，从不计较地位高低，不计较名利得失，总是把成绩归功于党，归功于人民。他曾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要具有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和百折不回的革命毅力。”

如今，先辈虽已远去，但他信念坚定、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勇于探索、与时俱进的革命精神，胸怀坦荡、以诚待人的崇高风范，却依然穿透时光，树立起了一座巍然屹立的精神丰碑!

“是丐尊，不是丐尊”——民国大家夏丏尊

在灿若星河的中国现代文化名人中，有一位学者大师堪称一代传奇。作为教育家，他桃李满天下，出于他门下的弟子有丰子恺、赵平复(柔石)、冯雪峰等著名人士；作为编辑出版家,他主持编辑出版的书刊享誉海内外。特别是《中学生》杂志，成为当年数十万计迷茫彷徨的中学青年的朋友。作为文学家，他凭着对文学的热爱自学成才，在中国文坛有着独自的位置。所写的《白马湖的冬天》等散文，至今被选进中国现代散文精品中。而作为翻译家，由他流着泪翻译的小说《爱的教育》，更使千千万万的读者也流下了感召的泪水。那句“教育没有了情爱，就成了无水的池” 走进了孩子的世界，,成为中小学校园里经久不衰的真正意义上的经典。这位学者大师就是横跨教育、编辑出版、文学、翻译四个领域的——夏丏尊先生

1866年，夏丏尊出生于浙江上虞一个商人家庭，年仅15岁就考取秀才。1902年又考入上海中西学院，次年考入绍兴府学堂，一年后辍学任塾师。1905年赴日本留学，1907年因学费无着落，辍学回国。次年任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通译助教，兼任舍监和国文教员。先后与鲁迅、陈望道、李叔同、朱自清等同事。两级师范改为浙江第一师范后，仍任国文教员，并被选为校友文艺部部长。

夏丏尊原名夏铸，“丏尊”是后来改的名，名字中的“丏”字对于很多人可能较为陌生，其实改名字与他为人公道正直的性格有关。当年，他为了避免当选他以为毫无意义的省议员，在选民册上把“勉旃”改为“丏尊”，好让写选票的人把“丏”字写成“丐”字，变成废票；此外，他不顾一切地自荐去兼当时吃力不讨好的舍监，一干就是七八年，只是为了抵抗当时轻视舍监的风气。

1920年，应湖南第一师范之聘夏丏尊来到长沙任教，担任湖南一师国文教员。也就在这里，一天，他漫步长沙街头，购得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的教育小说《爱的教育》日译本。回到寓舍，开始阅读，竟被书中的描写深深感动，“亲子之爱，师生之情，朋友之谊，乡国之感，社会之同情”，在他的内心深处引起强烈共鸣。他用了三个夜间流着泪读完全书，认为书里展示的简直“都已近于理想的世界”，于是他决心要将它翻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国读者。但苦于生活无定，环境嘈杂，迟迟没有动笔。一直到1922年，回到故乡浙江省的上虞春晖中学任教，建好了私宅平屋，有了安定的环境，有了闲暇的时间，才开始翻译。为了准确表达原作的内容，他又设法买来该小说的英译本。

每到夜深人静，夏丏尊就会走进他的“小后轩”，点上煤油灯，翻开日译本和英译本，铺开稿纸，开始翻译。上虞的冬天本来就特别冷，加上“小后轩”在平屋的最北边，朝北的窗户缝隙不小，寒风直往里钻，更是冷得出奇。夏丏尊生起炉火写上一阵就要凑到火盆上搓搓手。夏天，小后轩的蚊子特别多，而且几乎全是疟蚊，他只好一手拿着蒲扇驱赶蚊子，另一只手交换着翻书和书写。通常要过了午夜12点才肯歇手。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大功告成。

同事们力荐发表。1925年，小说首先在《东方杂志》上连载，好评如潮;后被列为文学研究会丛书，出单行本，由商务印书馆发行;1926年由开明书店发行，从此至解放初的二十多年里，小说再版三十余次，成为全国最畅销、最具影响力的书籍之一。

在夏丏尊的教育生涯里，自始至终践行着“爱的教育”。 他总是有着足够的耐心与爱心，对学生如对子女。 丰子恺在《悼夏丏尊先生》中说 “直率开导，不用敷衍、欺蒙、压迫等手段。” 朱自清说：“他的态度永远是亲切的，他的说话也永远是亲切的。”

1925年3月，夏丏尊拿出全部积蓄与朱自清在上海发起成立立达学会，创办立达学园。1926年，开明书店成立，夏丏尊出任编辑所长。1930年，夏丏尊创办《中学生》杂志，次年3月任社长，叶圣陶任主编。夏丏尊与叶圣陶在立达学园相识，后在开明书店长期共事，还结成了儿女亲家。两人志趣相投，在政治、文艺尤其是语文教育上的很多观点相同，都有着深厚的文字修养，他俩在开明书店合作编写了一大批备受读者喜爱的关于国文教授和读写的书籍，这其中有《文心》、《阅读与写作》和《初中国文教本》等，这些著作的问世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它标志着中国初步建立起了现代语文教学的理论体系。1933年，为帮助失学青少年自学中学的全部课程和谋生的必需艺能，他开办了上海市私立开明函授学校，自任校长。夏丏尊是一位理想家。他有高远的理想，但并不是空想。他少年时倾向无政府主义，一度想和几个朋友组织新村，自耕自食，但是没有实现。他办教育，也是理想主义的。夏丏尊和鲁迅交游共事，思想上、文学上都受到鲁迅的影响。1909年就参加了鲁迅、许寿裳等发动的反对尊孔复古的“木瓜之役”。后来又在鲁迅启发下提高对文学的兴趣。当时鲁迅还没有写小说，也没有用鲁迅的笔名，但已立志通过文学改造国民精神，并开始从事翻译，他见夏丏尊对小说的热爱，曾以《域外小说集》相赠，使夏“眼界为之一亮”，从此不断扩大阅读视野，所以夏丏尊自称是“受他（鲁迅）启蒙的一个人”。

1936年6月，中国文艺家协会成立，夏丏尊当选理事并被推为协会主席，任《新少年》杂志社社长。1937年抗战爆发，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机关报《救亡日报》创刊，任编委。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上海租界，夏丏尊拒绝为日伪办事。1942年，他被日本宪兵司令部逮捕，以“我是中国人，不会给日本人干事”，拒绝出任日本人办的杂志编辑，后经友人内山完造等保释出狱。抗战胜利后，他与傅东华等文教界老友筹设中国语文教育会，准备继续振兴文化运动。1945年11月，他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家协会上海分会理事，但因牢狱生活已毁了他的健康，于1946年4月23日在上海病逝，葬于白马湖畔。当时的重庆《新华日报》曾发表题为《悼夏丏尊先生》的社论，赞誉他是“民主战线的老战士”。

从一位秀才出身，夏丏尊虽没有一张文凭。但是他好学上进，孜孜不倦从生活中、从工作中、从书本中学习，成了一位博学多才的导师、学者和专家。正如作家唐曾经说过:夏丏尊先生“朴直，和善，诚敬，作为教育家，他自己便是‘爱’的全部化身”，此言不虚。

“是丏尊，不是丐尊。”这是出在他去复旦大学任教上第一节课时，在黑板上写下的一句话——“浙江上虞人，没有什么洋翰林、博士头衔，但希望注意：是丏尊，不是丐尊。”让我们记住这位横跨文学、翻译出版、教育、翻译的一代大师——夏丏尊。

“苏区包公”何叔衡的“纪律建设”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始终把纪律建设放在重要位置。100年来，我们党能从风雨如晦的历史深处走来，由小变大，由弱到强，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原因就是党有纪律有规矩。

党的纪律建设，也是一代代共产党人艰辛努力的结果。有一位从湖南第一师范走出的杰出校友，曾在中央苏区厉行反腐，令腐败分子闻风丧胆，被广大群众誉为“苏区包公”“反腐先锋”“何青天”，为我党初期的党风党纪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就是中共一大代表、红色政权首任“最高检察长”和“首席大法官”何叔衡。

与毛泽东在湖南一师的峥嵘岁月

何叔衡是湖南宁乡人，26岁时考中秀才。由于对清政府镇压各地的反帝运动不满，所以当县衙门派人送来请他去掌管钱粮的任职书时，他拒绝了这个肥缺，而宁愿在家乡种地，以教私塾为业，过着“穷秀才”的生活。1913年春，已经37岁的何叔衡为求新学，毅然来到长沙，报考了湖南第四师范,翌年第四师范与湖南第一师范合并，何叔衡被编入讲习科一班，成为当时第一师范年龄最大的学生，也与同时从湖南第四师范随校来到第一师范求学的毛泽东成为了校友。第一师范当时是湖南最好的新式学堂，这里有民主开明的教学理念，有一批思想进步、学识渊博的老师，也吸引了毛泽东、蔡和森、李维汉、张昆弟、罗学瓒等一大批优秀青年来此求学。何叔衡身体结实，个子较矮，但对人赤诚热心，最肯出力，也最刻苦。他的这些朴素、坦诚、踏实的品格，深受朋辈赞许。他经常和小他17岁的毛泽东一起谈学问、谈人生、谈国事，很快成为志同道合的战友。他的学问、见解和品行，深受毛泽东尊敬，而毛泽东的政治抱负和求知欲望，也使何叔衡十分钦佩，两人很快就成为“忘年交”。何叔衡于1914年7月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先是在长沙楚怡小学任教，1921年下学期接替毛泽东担任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主事。

1918年4月14日，何叔衡和毛泽东、蔡和森等发起成立了新民学会，成为新民学会首批21名基本会员中年纪最大的会员和重要骨干成员。作为一个进步的学术团体，新民学会的最初的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了保持团体的纯洁性，会章规定所有会员必须遵守五项纪律：一、不虚伪；二、不懒惰；三、不浪费；四、不赌博；五、不狎妓。新民学会是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先声”，这五项纪律，也是中国共产党纪律的雏形和源头之一。可以说，在新民学会时期，何叔衡心里就种下了纪律建设的种子。

当毛泽东、蔡和森等人为赴法勤工俭学在北京、上海等地奔波时，何叔衡就成为新民学会在长沙的实际负责人——执行委员长。1919年，何叔衡协助毛泽东等发起“驱张运动”，召集长沙市各校师生代表，提出“张毒一日不出湘，学生一日不返校，教师一日不受聘”的口号，不顾安危坚持与学生们站在一起，直到驱张运动胜利。

1920年7月，毛泽东发起创办文化书社，何叔衡出资支持，并四处奔走筹集资金。同年8月22日，何叔衡还与毛泽东等共同发起组织了湖南俄罗斯研究会。这时期，何叔衡担任湖南通俗馆馆长兼《通俗日报》社社长，积极在《通俗日报》上传播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使报社成为新民学会活动的重要基地

1921年7月，何叔衡同毛泽东一道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不久又一同创立了中共湖南支部、中共湘区委员会，并任组织委员，为中国共产党和湖南省级组织的成立做出了突出贡献，成为毛泽东早年最信任、最亲密的战友。毛泽东曾高度赞扬他：“叔翁办事，可当大局。”

背着“三件宝”在中央苏区开展反腐建设

1931年11月，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建立了中央工农检察部。何叔衡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主席毛泽东推举出任工农检察部人民委员，成为红色政权首任“最高检察长”。1932年2月，鉴于工作认真出色，何叔衡又被毛泽东力荐兼任临时最高法庭主席，成为红色政权首任“首席大法官”。之后又兼任内务部长等职务，身兼监察、司法、民政等数职。

何叔衡十分担忧党内腐败贪污，认为必须开展反贪污斗争，并探索出一条检察与舆论监督相结合的反贪道路。何叔衡还接受副部长梁柏台的建议，在各级工农检察部设立控告局，且各级控告局直属于各该级工农检察部或科，并受其指导或节制，控告局之间没有上下级隶属关系。控告局是苏区工农检察机关，接受工农劳苦群众对苏维埃政府机关和经济机关的控告，并调查控告的事实。

何叔衡认为，“政权从建立的那一刻起就必须被监督。不等群众上访，就先下访。”在制度建设的同时，在司法系统一把手何叔衡主持之下，一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惩腐肃贪运动在中央苏区轰轰烈烈展开了。为了将惩腐肃贪运动进

行到底，他不但时常召集工作人员开会，发动大家分头深入基层进行摸底，而且他本人更是身体力行，时常带上干粮、下乡走动调查、走访群众了解群众的想法。他白天和群众在田间地头边干边谈，晚上召集部分干部群众座谈，将大家说的事情记在记事簿上，再整理成材料。

在下访之时，何叔衡身上随时背着三件物品：布袋子、手电筒和记事簿，这三件物品被大家戏称为“三件宝”。手电筒用来照明走夜路；布袋子是何叔衡自己设计，然后请人特制的，布袋子里面分成几个小袋子，叫“袋中袋”，每个小袋都有它特定的用处；记事簿上几乎无所不记，东西虽多，但条理清晰，杂而不乱，何叔衡说：“人老了，脑子不管用，记在本子上忘不了。”

通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发现有相当一部分县、区政府，单靠行政命令去解决问题，有的甚至吞没公款，贪污腐化。何叔衡认为，这些问题如不及时克服，将直接威胁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于是，他将这些情况向毛泽东、项英等苏区领导作了汇报。1932年2月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常务会议。会上，何叔衡将了解到的情况作了全面汇报，有事实，有根据。他提议：中央政府要立即对那些执行上级命令和法律疏忽懈怠的现象及一切贪污腐化分子给予严厉打击。此建议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赞同。接着，人民委员会发布第五号命令，指出：“这些工作的检查，刻不容缓，各级必须坚决执行”，“各级政府应绝对执行这一工作，不得稍有玩忽和怠工”。人民委员会的指令发出以后，何叔衡再次背上他的“三件宝”，率领人马又深入各县区进行检查、督促、落实。

排除干扰公审判决高级干部左祥云死刑

何叔衡以检察与舆论监督相结合的举措在苏区开展反贪污，取得了卓越成效，处理了诸多贪污腐败的大案、要案，沉重打击了党内的贪污腐败现象，对我党初期的党风建设做出了贡献。何叔衡作风正派，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方针。他经手的案子，力求重罪不轻判、轻罪不重判,沉重地打击了贪污腐败分子，营造了“苏区干部好作风”的良好局面。

当时反腐大案的一个典型，即左祥云案。1933年8月，中央苏区为筹建中央政府大礼堂和修建红军烈士纪念塔、红军检阅台等，设立了“全苏大会工程处”。“全苏大会工程”是当时最大的工程建设，因为经费有限，中央政府采取了发动群众购买公债、自愿捐款、厉行节约、支援建设等措施，筹集了10万元的资金和建材物质，中央政府总务厅任命左祥云为主任。

工程建设不久，有人举报左祥云与总务厅事务股长管永才联手贪污工程款，经常大吃大喝，还强迫群众拆房，随意砍伐群众树木。何叔衡当即组织人员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左祥云在任职期间勾结反动分子，贪污公款246.7元，并盗窃公章，企图逃跑。何叔衡查实之后气愤地说：这些都是苏区人民的血汗钱!是老百姓勒紧裤带省下来的呀!竟被这些贪官肆意挥霍，天理难容!毛泽东下令总务厅扣押了左祥云，听候处理。然而，总务厅管理处处长徐毅却私自放走了左祥云。事情发生以后，毛泽东责令工农检察部一定要将民愤极大的左祥云一案查个水落石出。

左祥云被抓回，总务厅的腐败问题被彻底暴露。1933年12月28日，毛泽东主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常务会议，讨论了左祥云及总务厅腐败案件。1934年1月4日，中央人民委员会公布了对总务厅厅长赵宝成撤职、管理处处长徐毅拘押讯办的决定。此时有人出来说情，进行干扰，致使审判大会迟迟无法召开。于是呈请毛泽东批准，终于在1934年2月18日公审判决左祥云死刑，其他犯罪分子也分别受到惩处。左祥云成为我党执政初期第一个因贪腐被枪毙的高级干部。

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在五四运动前后，何叔衡就立志为国家、为民族干一番事业。在我党创立时期，他还强调“革命者就要抱定舍身忘家的决心。”这是他作为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一生的真实写照。

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统治，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于1934年开始被迫踏上长征路。转移前，何叔衡接到命令留在苏区坚守游击战。此时，他已是年近六十的老人，却仍然每天手柱拐杖，穿着一双破烂鞋子，早出晚归，不辞劳苦地开展游击战争，为红军主力转移争取更多时间。1935年初，党组织决定派人护送何叔衡等人前往上海工作。2月24日，在途经福建长汀时被敌人发现，遇到敌军三面包围。当护送队架起年长有病的何叔衡往山上转移时，他为了不拖累大家，要求转移队队长邓子恢朝他开枪，但遭到邓子恢拒绝。在转移至一悬崖边上时，何叔衡毅然跳下悬崖。由于掉落在水田里，只是重伤。后被敌军搜索发现，奄奄一息的何叔衡抱住其中一人的腿拼死搏斗，被敌人连击两枪，壮烈牺牲。临难不苟的何叔衡用生命践行了他“我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铮铮誓言，成为中共一大代表中最早牺牲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长征到达陕北以后，董必武这样称赞他：“叔衡同志的肉体被消灭了，他的精神不死，现在有几十万、几百万的人踏着他的血迹前进纪念着他。他个人死了，他在千

万人的心坎上还活着，那些杀害他的人，已被钉在永远耻辱的柱子上。”2009年9月，何叔衡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我不是天才，我本想当教书先生”

编者语：

“经师易求，人师难得。”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教师要成为大先生”不仅充分表达了对教师的尊重，也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成为大先生、成就大先生，将成为我国教育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命题。湖南第一师范办学过程中，涌现出了许多名师大家，他们学高为师，厚德为范，卓越自励，情怀未央，从“教书匠”超拔为“大先生”，永恒的精神是留给湖南一师一笔宝贵的财富，也堪称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不朽的丰碑。在第38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推出“永恒的精神 永远的‘大先生’”系列活动，旨在勉励更多的人民教师铸师魂，明大德，育大才，担大任，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我不是天才，我本想当教书先生”

——教员毛泽东

“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一个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的光荣，一个民族源源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好老师则是民族的希望。”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教师的高度评价，也是教师们献身教育事业的价值追求所在。

一代伟人毛泽东正是从教师这一神圣职业出发，在孜孜不倦追寻国家救亡图存之路时，担负起传播革命信仰的职责使命，并最终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民族命运和国家面貌。

1913年春，20岁的毛泽东报考了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第二年，学校并入湖南公立第一师范学校（以下简称“一师”），他随校转入一师被编入本科第一部第八班，决心读师范、从事教育。

1917年10月，毛泽东在“一师”筹办工人夜学，从此开始“教师”生涯。两年后，毛泽东在长沙修业学校高小部担任历史教员。在修业小学任职期间，毛泽东广泛接触长沙教育界、新闻界和青年学生，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在历史课堂里，他摆脱过去僵化的教学模式，贯通古今、史论结合，启发学生的历史思维和爱国热情，深得好评。

“五四运动”爆发后，毛泽东以教员身份创办并主编湖南学生联合会会刊《湘江

万人的心坎上还活着，那些杀害他的人，已被钉在永远耻辱的柱子上。”2009年9月，何叔衡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我不是天才，我本想当教书先生”

编者语：

“经师易求，人师难得。”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教师要成为大先生”不仅充分表达了对教师的尊重，也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成为大先生、成就大先生，将成为我国教育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命题。湖南第一师范办学过程中，涌现出了许多名师大家，他们学高为师，厚德为范，卓越自励，情怀未央，从“教书匠”超拔为“大先生”，永恒的精神是留给湖南一师一笔宝贵的财富，也堪称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不朽的丰碑。在第38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推出“永恒的精神 永远的‘大先生’”系列活动，旨在勉励更多的人民教师铸师魂，明大德，育大才，担大任，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我不是天才，我本想当教书先生”

——教员毛泽东

“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一个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的光荣，一个民族源源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好老师则是民族的希望。”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教师的高度评价，也是教师们献身教育事业的价值追求所在。

一代伟人毛泽东正是从教师这一神圣职业出发，在孜孜不倦追寻国家救亡图存之路时，担负起传播革命信仰的职责使命，并最终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民族命运和国家面貌。

1913年春，20岁的毛泽东报考了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第二年，学校并入湖南公立第一师范学校（以下简称“一师”），他随校转入一师被编入本科第一部第八班，决心读师范、从事教育。

1917年10月，毛泽东在“一师”筹办工人夜学，从此开始“教师”生涯。两年后，毛泽东在长沙修业学校高小部担任历史教员。在修业小学任职期间，毛泽东广泛接触长沙教育界、新闻界和青年学生，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在历史课堂里，他摆脱过去僵化的教学模式，贯通古今、史论结合，启发学生的历史思维和爱国热情，深得好评。

“五四运动”爆发后，毛泽东以教员身份创办并主编湖南学生联合会会刊《湘江

评论》。1918年，毛泽东以优异成绩从“一师”毕业，后被聘为“一师”附小的主事（校长），兼任师范部国文和历史教员。这时的他已经是一位心有所念、行有所持的革命知识分子。

在这段时间，毛泽东在湘潭教育促进会中发挥作用，提倡教育者通过教育理论和方法的进化促进社会的进化；他发起文化书社，他坚持办夜学补习班，他两赴安源进行调查研究，积累了领导工人事业的经验；他开始着手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12月，在他的引领下，中国共产党长沙早期组织成立。

1921年11月，毛泽东在填写《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终身志业调查表》时，在“终身欲研究之学术”栏中填的是“教育学”，在“终身欲从事之事业”栏中填的是 “教育事业”。

1922年冬，为了全身心投入初创时期的艰苦革命事业，毛泽东辞掉教职，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从此，他的一生与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对“教师”这一职业的深厚感情，伴随毛泽东走过一生，并在晚年多次被提及。20世纪50年代后期，他多次公开讲，“我退休以后可以给《人民日报》写点杂文，可以到大学做教授。”1960年6月21日，毛泽东接见日本文学代表团，兴致勃勃地谈到自己年轻时的志愿，他说，“我读的是师范学校，是准备当教员的，没有想到后来会去打仗……”可见，毛泽东对教育事业的留恋和一片深情。

从最初的“教育救国”到后来的“革命救国”，青年毛泽东始终把个人理想与祖国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他是当年众多进步知识分子的缩影，他是永恒的大先生。回顾中国百年奋斗史，今天的我们，牢记立德树人初心，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追寻大先生的光辉足迹，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四有好老师。

第一期朗读者：

杨丹，副教授，毛泽东与第一师范纪念馆/红色教育培训学院（主持工作）副馆长。

“湘中作家”——黎锦明

湘潭县长塘村，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这里有一个书香门第——黎氏家族。黎家的祖父黎葆堂，是清末举人。他的儿子黎松安是秀才。黎松安生了八个儿子，被称为“黎氏八骏”，都是中国近现代史赫赫有名的人物：大哥黎锦熙，是驰名中外的语言学家。二哥黎锦晖和七弟黎锦光，是我国有影响的音乐家。三哥黎锦耀，曾任过南京中华矿学杂志主编，是采矿、冶金方面的专家。四哥黎锦纾，青年时留学德国，是我国机械制造工程方面的先驱。五哥黎锦炯，曾任铁道部专业设计院总工程师。八弟黎锦扬，是华裔美籍现代作家。老六黎锦明是在这样一个富有文化传统家庭熏陶下成长起来，被鲁迅先生誉为“湘中作家”的文豪。

黎锦明1905年4月18日出生，幼名艮甫，学名均亮，锦明是他的族祠排名。五岁开始接受启蒙教育，从小喜爱文学和美术，酷爱齐白石的画作。 1919年年底，黎锦明在长沙岳云中学读书。岳云中学是一所政治思想开放、艺术空气活跃的学校。徐特立、赵景琛都曾在这里任教，杨开慧、蒋冰之在这里读书学习，赵景琛他对黎锦明的学习尤为关心。他们当时组织了楚魂艺术社，积极开展文艺创作活动。黎锦明擅长美工设计，担任了学生自治会的编辑主任。1924年春，黎锦明以优秀的成绩考入国立北京艺术专科学校。在这里，他广泛接触欧美文学和“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他贪婪地读着巴尔扎克、雨果、莫泊桑、罗曼·罗兰、鲁迅、周作人、郁达夫等的作品。1924年3月7日，他写出了第一个短篇小说《小画家》。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黎锦明满怀激愤，以“日本纱厂虐待华工的事实”写下了短篇小说《小黄的末日》，以“英国船员虐待华工的事实”写下了短篇小说《船夫丁福》。这两篇“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文学作品，在文坛影响极大。

1926年夏初，他来到上海，集结1924年至1926年的12个短篇，以《烈火》为书名，由赵景深介绍交给开明书店出版。这年秋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的高潮中，黎锦明到了我国农民运动最早兴起的地方海丰，从事农运区的文化教育和宣传工作。“四一二”政变后，他化妆从海丰逃出，转乘海轮回到上海。此时他的思想日益激进，言论日益激烈，写成我国新文学史上第一部较为全面地反映党领导下的农民运动的中篇小说《尘影》，作品歌颂了波澜壮阔的农民运动和共产党人献身工农事业的高贵品德，也揭露了土豪劣绅的残暴和国民党右派叛卖革命的罪行。作品的成功，在于塑造

了一位早期革命知识分子“熊履堂”的主人公形象。熊履堂有着坚定的信仰和分明的爱憎情感，他深入群众，了解实际，献身工农斗争。当“四·一二”政变的反革命屠刀搁在脖子上时，从容就义，无半句求饶的话。这篇作品得到鲁迅先生的充分肯定，并为之作序《〈尘影〉题辞》。他同鲁迅先生的来往是很多的，光《鲁迅日记》记载的就二十多次。往来中，鲁迅先生曾为他的创作集写过序言，发过评论文字，更多的是传授创作上的经验、体会，帮助修改文章，给了他不少的教育和帮助。1928年，黎锦明赴河南郑州《朝报》副刊工作，不久因《尘影》一书的被告发，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几乎被枪毙。出狱后，先后任过北平中国大学讲师、保定河北大学和浙江大学教授。

1932年初，日寇在上海发动新的进攻。驻上海的十九路军和上海人民在蔡廷锴、蒋光鼐的领导下奋起抵抗，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当时黎锦明正在上海，“住在离日寇营房只有半里的江湾路”，看到并了解到“一·二八”战事的情况。次年三月，他结束了河北大学的教学工作回到上海，写下了歌颂上海军民英勇抗战，揭露日寇暴行的中篇小说《战烟》。作品描写了十九路军广大将士和上海广大人民爱国的英勇奋战精神。1933年底，《战烟》一书出版了，影响极大。作品内容强烈的针对性引起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惊恐，他们通过江湾警察局拘留黎锦明，后在舆论压力下释放了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黎锦明认为“猛虎不可驯，只可以杀”，因而主张“对抗”、“进袭”。而对国民党“当局的短视自私，迁就依赖，寄希望于国联的调查、调解”极其不满。他公开指出那种鼓吹只有中日亲善“以防共产党得“渔人´之利”、“才可以免得东亚全部陷落”的论调为汉奸言论，并予以严辞驳斥。

“七·七”事变后，他回到湖南，先后在衡山乡村师范、桥头河湖南省第一师范和湖南新宁中学、贵州独山扶轮中学、湘潭石浦中学等校任教，长则一年，短则几月。他还参加了湘潭、安化联合抗日区的抗战工作。在石浦中学任教时，他已是四十多岁，有了两个孩子，可他仍然像青年人一样参加了省民众训练指导处的军事训练。为了适应战况，他和石浦中学的同事们采取化整为零，灵活机动的办法上课：流动教室分小班进行，敌来我散，敌去我集。尽管日本侵略者“清剿”频繁，但教学工作始终未曾中断。文艺创作也没有中断。先后给茅盾在香港主编的《文艺阵地》、郁达夫在新加坡主编的《星洲日报》和戴望舒在香港主编的《星岛日报》副刊《星座》等报刊，写了《别面报告》、《河口得画》和《你看见了什么》等作品，揭露了国统区的混乱和黑暗，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凶残和暴虐。

1948年，黎锦明在湖南大学外语系教授“文学批评”。直到1949年湘潭解放。1950年被选为湘潭县人民代表，同时参加湖南省人民政府教育厅教员考试取录。1953年在湖南永顺中学、湘西民族中学任教五年半。1951年春节，毛主席邀请黎锦熙去中南海作客，谈话中问及他的弟弟黎锦明的情况，并夸奖他早期的作品有强烈的反封建意识。1952年，郭沫若亲笔给湖南省人民政府写信介绍黎锦明的情况，充分肯定他在大革命时期的功绩和在新文学上的贡献。同年，他被选为湖南省政协委员和省文联委员。毛泽东的关怀，郭沫若的肯定，党和人民给他的荣誉，使他感到温暖和激动，他更加忘我地工作。湘西吉首至今还流传一则关于他的“半边脑壳上讲台”的笑话。说的是他在民族中学教书的时候，他有一次利用午休时间去理发，因理发的人太多，等到他理时，才理到一半，上课铃响了，他即对理发师说：“我现在有事，等一下再来理吧！”说着站起身来，连头发屑也来不及拍掉就匆匆跑进教室。同学们看着他那理了半边头发的脑壳，始而目瞪口呆，继而忍俊不禁地哄堂大笑。他却若无其事，仍然严肃认真地讲课。1955年任中国作家协会湖南分会会员。1959年在湘潭大学任教一个学期。1978年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参事室秘书，1983年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在1981年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纪念的日子里，他虽不能动笔，但还能清晰地回忆二十、三十年代与鲁迅的交往，请人代笔写了回忆鲁迅的文章数篇，在《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缅怀鲁迅的伟大战斗业绩及其对青年的无比关怀和亲切培养。198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黎锦明小说选》。1987年香港南方书屋出版了《黎锦明中篇小说集》。

晓霞山下的长塘村，至今耸立着一幢两层砖瓦新楼房，大门两边贴着一副大红对联：“政符民意家邦旺，春到人间草木知”，横批是“国强民富”。新修的院子里，有一位身高背驼、满脸皱纹、眼窝深陷的瘦削老人，他身穿一件涤纶便装新棉袄，头戴一顶风雪帽，自在地在院子里徜徉着。有时搬一把躺椅坐在大椿树底下，翻阅着新出版的报刊杂志。这位历经沧桑和坎坷的老人,就是被鲁迅称为“湘中作家”的黎锦明先生。

1999年4月2日，黎锦明先生在湖南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去世，享年94岁。

了一位早期革命知识分子“熊履堂”的主人公形象。熊履堂有着坚定的信仰和分明的爱憎情感，他深入群众，了解实际，献身工农斗争。当“四·一二”政变的反革命屠刀搁在脖子上时，从容就义，无半句求饶的话。这篇作品得到鲁迅先生的充分肯定，并为之作序《〈尘影〉题辞》。他同鲁迅先生的来往是很多的，光《鲁迅日记》记载的就二十多次。往来中，鲁迅先生曾为他的创作集写过序言，发过评论文字，更多的是传授创作上的经验、体会，帮助修改文章，给了他不少的教育和帮助。1928年，黎锦明赴河南郑州《朝报》副刊工作，不久因《尘影》一书的被告发，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几乎被枪毙。出狱后，先后任过北平中国大学讲师、保定河北大学和浙江大学教授。

1932年初，日寇在上海发动新的进攻。驻上海的十九路军和上海人民在蔡廷锴、蒋光鼐的领导下奋起抵抗，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当时黎锦明正在上海，“住在离日寇营房只有半里的江湾路”，看到并了解到“一·二八”战事的情况。次年三月，他结束了河北大学的教学工作回到上海，写下了歌颂上海军民英勇抗战，揭露日寇暴行的中篇小说《战烟》。作品描写了十九路军广大将士和上海广大人民爱国的英勇奋战精神。1933年底，《战烟》一书出版了，影响极大。作品内容强烈的针对性引起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惊恐，他们通过江湾警察局拘留黎锦明，后在舆论压力下释放了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黎锦明认为“猛虎不可驯，只可以杀”，因而主张“对抗”、“进袭”。而对国民党“当局的短视自私，迁就依赖，寄希望于国联的调查、调解”极其不满。他公开指出那种鼓吹只有中日亲善“以防共产党得“渔人´之利”、“才可以免得东亚全部陷落”的论调为汉奸言论，并予以严辞驳斥。

“七·七”事变后，他回到湖南，先后在衡山乡村师范、桥头河湖南省第一师范和湖南新宁中学、贵州独山扶轮中学、湘潭石浦中学等校任教，长则一年，短则几月。他还参加了湘潭、安化联合抗日区的抗战工作。在石浦中学任教时，他已是四十多岁，有了两个孩子，可他仍然像青年人一样参加了省民众训练指导处的军事训练。为了适应战况，他和石浦中学的同事们采取化整为零，灵活机动的办法上课：流动教室分小班进行，敌来我散，敌去我集。尽管日本侵略者“清剿”频繁，但教学工作始终未曾中断。文艺创作也没有中断。先后给茅盾在香港主编的《文艺阵地》、郁达夫在新加坡主编的《星洲日报》和戴望舒在香港主编的《星岛日报》副刊《星座》等报刊，写了《别面报告》、《河口得画》和《你看见了什么》等作品，揭露了国统区的混乱和黑暗，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凶残和暴虐。

甘做“焦官”的谢觉哉

在毛泽东与第一师范纪念馆里，陈列着被尊称为“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同志1921年6月29日的一篇日记：“六月二十九日，阴。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这篇看似平常的日记于无声处听惊雷，他记载了毛泽东与何叔衡从长沙出发，远赴上海参加中共一大的历史画面，也为后来确定中国共产党建党日期提供了极为珍贵的文献佐证。而谢觉哉的一生也随着红船一道扬帆起航。

谢觉哉1884年出生于湖南省宁乡，是我国法学界的先导和人民司法制度的奠基者。他的一生横跨了三个时代，21岁时考上中国科举最末一代秀才，后追求新思想出外求学、任教，1920年到1923年期间，谢觉哉受时任第一师范第一附属小学主事的毛泽东之邀聘担任附小的国文教员。他深受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等人的影响，加入新民学会，参与创办工人夜学、平民补习班，主编《湖南半月刊》《湖南民报》等进步报刊，积极宣传民主革命思想，激发工农群众抨击封建军阀的统治。1925年，41岁谢觉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完成了由一个封建秀才向共产主义战士的蜕变，走上革命的道路。此后，从湘鄂西苏区到中央苏区，从陕北、甘肃到延安，谢觉哉发挥自己的所长从事宣传教育和法律工作，主持起草了中国红色革命政权最早的《劳动法》《土地法》《婚姻条例》等一系列法律；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任内务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为党献身常汲汲，为民谋利更孜孜”，这是延安时期人们向谢觉哉祝寿时赠送的诗句，也是他革命人生最真实的写照。

谢觉哉虽身居高位，但从不以元老自居，对待自己和家人极为严格， 他甘做“焦官”，不做高官的家风故事广为流传。

故事发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谢觉哉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部长，消息传到湖南宁乡老家后，乡亲们奔走相告，家中的子女们也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写信给父亲，希望能到北京看望父亲并谋个好前程。谢觉哉收到信后，于1950年1月21日给两位儿子写了一封回信，信中他这样写到：

子谷、廉伯：

儿子要看父亲，父亲也想看看儿子，是人情之常。

……你们筹措路费不易，到这里，我又替你们搞吃的住的，也是件麻烦事。如你们还没起身，可以等我一下，等到今年秋收后，估计那时候光景会好一些。到那时来看我，是一样的。打听便车是没有的。因为任何人坐车，都要买票。

你们会说我这个官是“焦官”。是的，“官”而不“焦”，天下大乱；“官”而“焦”了，转乱为安。有诗一首：

你们说我做大官，我官好比周老官（奇才大老官）；

起得早来眠得晚，能多做事即心安。

问你母亲好。

父字

一月二十一

这封信语言平实，一句“儿子要看父亲，父亲也想看看儿子”，充满了一个慈父对孩子的爱和思念。但紧接着谢觉哉以严父地口吻告诫孩子不要想着沾父亲的光，连搭便车的事情都是不行的。而一首打油诗，又尽显谢老语言文字的魅力，他通俗易懂地将自己不谋私利、廉洁奉公的人生追求传达给自己的孩子。这里的“焦官”是湖南方言，指不挣钱的官。周老官，名周奇才，是家乡一位勤劳能干的长工，在乡村以老实闻名。

谢觉哉告诫孩子：当官如果为了挣钱，天下则大乱；当官如果不是为了挣钱，天下就大好。他还以“周老官”自喻，无疑是在告知子女，他当的是共产党的官，是新社会的“勤务兵”，就是为人民服务的长工，不是封建社会中“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旧官僚。

谢觉哉的子女在这种优良家风的影响和教育下，艰苦朴素，低调勤勉。大儿子谢廉伯在家务农，二儿子谢子谷遵照谢觉哉的嘱咐，在县里献身于党的教育事业，其他几个子女也凭借自己的努力，在普通的工作岗位上默默奉献。谢觉哉用自己的一言一行，不仅为他子女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同时也激励着我们当代党员干部时刻权衡“焦官”与“高官”的天平，牢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吃水不忘挖井人

《吃水不忘挖井人》，这是一首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红色歌曲，唱的是当年毛主席带领红军战士帮助沙洲坝的乡亲们喝上井水的故事。解放后，当毛主席收到沙洲坝的乡亲们托人捎来的两瓶井水时，他无限感慨地说道：“江西老　吃水不忘挖井人。其实那次挖井，主要是方先生，我只是敲敲边鼓。”

那么，毛主席说的方先生是谁呢？

他就是毛主席在第一师范求学时的老师——方维夏。

方维夏，出生于湖南平江，24岁那年怀揣教育救国的梦想，远赴日本留学。学成回国后，他在第一师范担任博物教员长达5年，与当时在第一师范求学的毛泽东相识，并结为了挚友。

1924年，方维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他投身北伐战争，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广州起义。1931年春，方维夏从苏联回到上海，被党中央派往苏区工作，担任闽西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

1933年，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迁往沙洲坝。“沙洲坝啊沙洲坝，没有水来洗手帕。”这是一个极度干旱缺水的村庄，因为缺水，当地老百姓的生活过得非常艰苦。毛主席指示，立刻着手帮助老百姓解决喝水的问题。时任苏区总务厅长的方维夏，因为在日本学过地质学，于是，主动请缨，带领军民接下了这个任务。没有专业的勘探队伍，没有精密的勘探设备，全凭着锄头、铁锹和双手。当水井打好的那一天，全村就像过年一样的热闹，乡亲们激动地说：“我们从来没有喝过这么甜的水，红军真是我们的大恩人哪！”一句“大恩人”，凝聚了多少老百姓对党的信任和感激；一句“大恩人”，又让多少像方维夏这样的共产党人为之浴血奋斗一生。解放后，沙洲坝人民就在井旁立了一块石碑，上面刻着：“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

1934年10月，因为中国革命的需要，红军开始长征。方维夏选择继续留在根据地领导游击战争。艰苦的环境，残酷的战局，让他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头发、胡子全白了。但是他领导的游击队，牵制了大量敌军，弄的军阀何健焦头烂额，于是，下令重金悬赏方维夏的人头。1936年4月23日，两声刺耳的枪声划破了桂东沙田黎明的静谧，方维夏和夫人双双倒在了叛徒罪恶的枪口下。可凶残的敌人并不罢休，他们惨无

人道的砍下了方维夏的头颅，先后悬挂在桂东城楼和长沙的街头。就这样，党的共产主义战士方维夏用自己的生命和热血践行了他的革命誓言：

“造福人，不享福。红军一心勇杀敌虏，党员齐心为工农服务，烈士将自己的热血献出。为什么这样？推翻压迫的缘故。”

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历史不能只被歌唱，更应该被铭记和传承。“吃水不忘挖井人”，在那段艰苦的岁月里，正是无数像方维夏一样的共产党员，带着“造福人，不享福”的初心和使命，始终与老百姓站在一起，才战胜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红井”甘甜，饮水思源。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上，我们不能忘记老一辈共产党人为之流血牺牲的伟大理想；更不能忘记，作为一名共产党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去做什么，该怎么做的历史使命！

春风化雨 润物无声——“民主教育先驱”孔昭绶

1917 年 5 月 7 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老师、同学们都聚集在礼堂，大家神情肃穆地望着台上正在慷慨激昂演说的校长，这位校长就是二度回校任职的孔昭绶、孔校长。这次大会正是在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两周年之际，一师师生特地召开的国耻日纪念大会。在这样一个国家危难的特殊时刻，孔校长作了长达一万多字的《国耻日纪念演说词》，期望能激励学生的爱国心和民族精神，知耻而后勇。孔校长语重心长地说道：“人，不可不知耻。耻，有个人之耻，国家之耻。德守不坚，学识愚昧，身体衰弱，遭人白眼，乃个人之耻。纲纪扫地，主权外移，疆土日蹙，奴颜卑膝，乃国家之耻。” 而一国之希望，在于青年；一国之未来，要由青年来担当，望着台下朝气蓬勃的学生们他大声疾呼：“然往事已矣，来日大难，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况在青年可不焦思尝胆，求为最后正当之防御与根本上之解决乎！特将当日中日交涉略举其颠末以相告，幸永永勿忘国耻焉！”孔校长的声音在礼堂内久久回荡、不能散去，他的每一句发问都令人发省，他振聋发聩的呐喊直击在场每位学生的内心，在他的深情呼喊下从一师走出了一大批有志青年。

而孔昭绶的“课堂”远不止这一次，在一师校内经常能看到孔校长与学生们探讨问题、切磋学问的场景。孔校长第一次上任，新生开学之际便在学生寝室给他们上了“入学第一课”——经世致用，读书之目的所在。他说道，“何谓经世？致力于国家，致力于社会谓之经世；何谓致用？以我之所学，化我之所用谓之致用。经世致用者，就是说我们不是为了读书而读书，我们读书的目的，我们求学的动力，是为了学得知识，以求改变我们的国家，改变我们的社会。那种关进书斋里，埋头故纸堆中做些于国于民无关痛痒的所谓之学问，不是我湖湘学派的特点，湖南人读书，向来只为了两个字：做事！做什么事呢？做于国于民有用之事！我中华百年积弱，正因为民智未开，只有大兴教育，才能以新知识、新文化扫除全民族的愚昧落后，教育人人，则人人得治，人人自治则社会必良，社会改良，则人才必盛，真才既出，则国势必张……” 几番言语便道尽了其教育主张的真谛。诸如此类言论，孔昭绶是常常说给学子们听的，这无疑是春风化雨，滋润着同学们的心灵。当然，孔昭绶并非只会纯讲道理，他更是用实际行动践行自己的教育理念，正如毛泽东所说：“孔校长是一位教育改革家，在第一师范两次任校长，为学校作出重要贡献。……我们从事学友会、新民学会、工人夜学、农村调查活动，都是孔校长这些教育改革后的产物。没有孔校长的

改革，就不会容许我们有这些活动。”

孔昭绶如此超前的思想与其相关经历是密不可分的。孔昭绶出生于湖南浏阳，从小刻苦攻读，参加过科举考试，乡试中秀才，曾担任过多所中学的教员，随后保送入湖南优级师范学堂，1910 年后留学日本政法大学，获法学学士学位，是一位“海归派”教育人士，有着开阔的视野和先进的教育理念。1913 年春，孔昭绶受聘至第一师范任校长，在任期间，他积极创办技能会，提倡学生自治和自助。随后，袁世凯称帝，知此消息后孔校长万分愤慨，出于义愤他发表了反袁相关文章，被军阀政府视为眼中钉，遭到政府通缉。1914年 1 月孔昭绶被迫东渡日本避难。在外漂泊两年后，孔昭绶应时任湖南省长兼督军的谭延　的邀请重回一师担任校长，孔校长深刻感受到国家之危难所在，国民之觉醒所在，为唤起学生的爱国之情，他提出以“知耻”为校训，大力宣传爱国主义思想，结果为军阀张敬尧所不容，再度被迫辞职。

尽管孔昭绶校长在一师两次任职时间加起来不过三年半时间，但他的教育思想、办学理念却给一师带来了一股清风。在孔昭绶校长的引导下第一师范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是一个有才华的校长，有担当的校长，懂教育会教育的校长。以身正己，以己律人。开民智，促学风，育人才，传道义，这次是真正的传道人，授业者！

觉醒者的响铃交响乐——易白沙

易白沙（1886–1921）原名坤，字越村，一作月村。以居白沙井，又慕名儒白沙先生陈献章，故更名白沙。教授、民主革命活动家。1917年任湖南第一师范国文、历史教员。

幼年好学，遍读经史百家，1903年16岁的易白沙应永绥同知吴传绮之聘在永绥（今湖南花垣县）师范学校任教，后随吴传绮至安徽，初主持怀宁中学，继为师范学堂、旅皖湖南中学校长。在中学任教期间，他潜心于研究郑思肖的《心史》以及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遗书，萌发了反清思想。在安徽期间，先后结识孙中山、章太炎、陈独秀等，深受民主革命思想影响，力图将“尚同”、“非攻、“兼爱”等主张，与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口号融为一体！并且贯彻到反封建斗争的言行中去。

1911年武昌起义后，安徽宣布独立。易白沙游说皖中将领支援武昌起义，由于革命力量弱，一些旧军人和流氓乘机捣乱，严重破坏怀宁的社会治安。易白沙与著名革命党人韩衍等组织青年学生为青年军，维持社会稳定。1913年，易白沙参加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而在革命失败后他和当时的一些革命者一样，流亡日本。在日本期间，他与章士钊创办了《甲寅》杂志，发表《广尚同》、《铁血之文明》等文章，揭露帝国主义和国内独裁者袁世凯祸国殃民罪恶本质的文章，启发国人觉醒。

1916年，易白沙在《新青年》上发表了《述墨》《孔子平议》等文章，抨击儒学，宣传民主与科学。易白沙最早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的学者，而他的文章成了新文化运动中的反孔檄文之一。易白沙率先揭开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批判孔子专制主义思想的序幕。他认为“中国二千年尊孔之大秘密”就在于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利用孔子为傀俑，垄断天下之思想，使失其自由”。为了打倒思想和学术上的专制主义，他明确倡导“真理以辩论而明，学术由竞争而进”的口号，他的观点体现了强烈的民主主义思想。显然，易白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斗士之一，是觉醒时代有勇敢的探索者之一。

1919年，他从上海回到长沙，易白沙当幽居独处，意气沉郁之际，对于当局感到非常失望，在此居住的两年时间内，他着手编写《帝王春秋》，列举论述了几千年来君主专制的丑陋恶习和腐朽管理弊端，孙中山先生曾评价该书是“从历史事实，唤

起知识阶级诛锄独夫民贼，可谓严于斧钺矣"。孙先生专门为该书题签推介，他非常欣赏易白沙，曾两次致信易白沙邀请易加入革命，“弟甚至欲得一能文者与共昕夕，以素所怀抱主义政策，见之文章，勒为条教，不审能助我否？”他未遽应。1921年4月底，他只身一人潜赴北京，力图暗杀北洋军阀的头目。但因军警戒备森严，未能得手。不久，易白沙才南下广州，会见孙中山，他请求“组队赴北方杀贼”，而当时的国民党头领们劝他“宜文章报国，不必赴险”。易白沙对国民党的主张感到失望。1921年端午节，易白沙渡船赴明代名儒陈献章故乡新会县陈村，吊念他所崇拜的陈献章，随即蹈海自杀，以死报国，时年35岁。

匡互生：怒火焚烧惩国贼 革故鼎新育英才

1919年5月4日，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掀起了伟大社会变革运动，以磅礴之力鼓动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志向和信心。在这场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中，有一位一师人以“火烧赵家楼”的英勇举动，奏响了浩气长存的爱国主义壮歌。他就是1920年8月至1921年8月担任第一师范教务主任的教育改革家——匡互生。

匡互生（1891—1933）字济，人俊，号日休，别名务逊、行，湖南邵东人。虽自幼家境贫寒，但勤奋好学，并兼习武艺，他疾恶如仇，好打不平。他从小立志“奋然而起，做点革命的工作”，1910年进入驻省邵阳中学读书，当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的时候，他曾跟随长沙革命军攻打巡抚衙门；1915年，16岁的匡互生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师大）预科，次年转入数理部本科。受《新青年》等进步刊物的影响，他与进步学友组织少年中国会，通过教育培养青年，改造社会。后又成立同言社，以讲演会、辩论会等形式，宣传和交流反帝爱国、教育救国思想。还以少年中国会为核心成立工学会，出版《工学》杂志，联络和团结各方爱国学生，揭露军阀政府的罪行，在社会上引起较大的影响。

1919年4月底，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回国内，引发了中国人民强烈的愤慨。社会各界纷纷通电，斥责日本的无理行径，要求中国政府坚持国家主权。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法政专门学校、高等工业等学校的进步学生召开紧急会议，号召大家奋起救国，并决定于5月4日齐集天安门举行游行示威。匡互生会后紧急召集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工学会会员及进步学生商议，积极响应游行示威的号召。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正如地底沸腾的岩浆，即将奔涌而出。

5月4日下午，北京高校的3000多名学生代表冲破军警阻挠，云集天安门，匡互生率领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最先到达。爱国学生打出“誓死力争、还我青岛”“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等口号，并且要求惩办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等人。匡互生走在游行学生队伍的最前面，当到达曹汝霖住宅时，匡互生第一个冲进曹宅，并带头举火焚烧，上演了火烧赵家楼壮烈的一幕，匡互生为真理和正义而战的精神，连同五四运动的熊熊烈火一起载入了史册。

1919年夏，匡互生从北京高等师范毕业。当时的中国国家蒙辱、人民蒙羞、文明蒙尘，怎样才能拯国家于危难？救生民于水火？匡互生在经过深思熟虑后，毅然选择了“教育救国”的道路。他回到长沙，先在楚怡小学任教，与毛泽东、何叔衡等人一起积极开展反日爱国运动和“驱张运动”。第二年夏，来到第一师范担任教务主任。正是在第一师范开放、包容的教育环境中，匡互生将对教育救国的满腔热忱化为革故鼎新的尖刀利刃，在校长易培基的支持下，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且意义深远的教育改革。

他深刻认识到，教师是学校发展的灵魂，是学生成长的引路人。因此，他撤换了部分迂腐消极的教员，建立德才兼备的教师队伍。他从北京、上海、杭州、武汉等地聘请了一批具有新思想的教员；从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大学以及浙江、湖北等地的高校挑选了一批青年有为的优秀毕业生来校任教，同时还聘请外籍教师教授英文。这批教师不仅业务上是一流的，而且具有同“五四”精神一致的新思想。让学校教学气象焕然一新。

同时，他还大力改革学校的用人制度，打破“唯学历”“唯资历”用人的窠臼，力排众议，破格录取最高文凭仅为第一师范毕业且在第一师范第一附属小学担任主事的毛泽东来到第一师范第22班担任国文教员。

在教学内容和方法上，他清除了一批颂扬封建主义的旧教材，采用教员编写的传播新文化、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新讲义；废除注入式、填鸭式的教学方法，积极倡导启发式、讨论式。他邀请杜威（美）、罗素（英）等国外学者以及恽代英、章太炎、章士钊等国内名流大家来校讲学，极大的开拓学生的视野，教学相长蔚然成风。

同时，他还突破学区范围，广招学生。招收了来自湖北、江西、浙江等地的学生以及来自朝鲜和南洋的学生。更为重要的是在匡互生的力促下，第一师范首开湖南教育界女禁，倡导男女同校，开辟了湖南中等徐东销男女同学的道路。1921年招收了第一届女生，编称第21班，使得第一师范成为湖南男女同校的第一校，培养了一批后来叱咤风云的巾帼英雄，如解放后担任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的曹孟君，就是21班的学生。

经过一系列的改革，当时第一师范被誉为“一所新型的学校”“湖南教育界的一面旗帜”。

1921年1月，匡互生与贺民范等人在邵阳创办长沙文化书社宝庆分社，积极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8月，赴杭州、绍兴创办“生社”，进行半工半读试验。1922年赴上海，在吴淞中国公学中学部工作，后赴浙江执教。

1925年，匡互生在上海江湾创办立达学园，以“修养健全人格，实行互助生活，促进文化以改造社会”为宗旨，以“立己立人，达己达人”为校训，试验学习、生产、生活三位一体的教育制度。1932年，立达学园毁于日军炮火，匡互生对教育的追求矢志不渝，他四处奔波筹款重建校舍，终因积劳成疾，于1933年4月22日病逝于上海，终年42岁。

1994年，匡互生的女儿匡达人和匡介人继承父亲遗志，在海口市重建立达学园。这里不仅是教书育人的殿堂，更如同一座丰碑，篆刻着匡互生先生怒火焚烧惩国贼的青春豪迈，他执着一生革故鼎新育英才的教育佳话终将在历史长河中恒久传扬。

李达：一大的召集人 理论界的鲁迅

“六月间，第三国际派了马林和尼可洛夫两人来到上海。他们和我们接洽了之后，知道我们党的情形，就要我即时召开党代表大会，宣告中共的正式成立。当时党的组织共有七个地方单位，我发出了七封信，要各地党部选派代表，到上海参加……”

这是一份李达关于中共一大的回忆，如今陈列在南湖革命纪念馆。

1969年4月，毛泽东在谈到中共一大时，特别讲到了李达，说他是一大代表，后来担任武汉大学校长。

李达，字永锡，号鹤鸣。湖南永州人。他自幼聪明好学，5岁就跟着父亲识字。1913 年李达以优秀成绩考取留日官费生，以实现 “实业救国”的志愿，但是这个美好的愿望很快就被残酷的现实打破了。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振聋发聩。李达看到了祖国的出路和民族的希望。为此，他全力钻研马列主义，迅速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笃信者和宣传者。留日期间，他写下了《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等文章，还翻译了马克思主义的通俗著作寄回国内出版。他由此被称为“播火者”，为大众播下马克思主义的火种。

1920年5月，李达抱着“寻找同志干社会革命”的目的回国，首先就去上海拜访了陈独秀。这时，陈独秀正在酝酿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交谈中，李达与陈独秀在组织共产党和社会革命等问题上意见完全一致。陈独秀惊讶于李达渊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陈赞他是年轻的社会学家，力邀李达共同作为共产党的发起人，李达欣然同意。1920年8月，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八人在《新青年》杂志社开会，正式成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陈独秀任书记。11月7日，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把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紧紧联系在一起，将一批真正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广大青年聚集起来。1920年12月，陈独秀赴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从1921年2月到党的一大召开。李达一直代理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书记的职务，担负了党的一大的筹备和召集工作。开会前夕，李达为选择会场伤透脑筋，会址最后设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李汉俊哥哥李书城的家里。参会代表的住宿，则安排在离李公馆不远的博文女校。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开幕，出席会议的湖南人有毛泽东、李达、何叔衡。会议期间，李达代表上海发起组介绍了自成立以来的工作情况，

并参与起草了党纲和今后的工作计划。7月31日，由于会议引起了敌人注意，经王会悟的安排，代表们悄悄转移到嘉兴南湖一艘游船上召开了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决议，确定了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决定设立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作为中央的临时领导机构，由陈独秀任书记，李达被选为中共中央局宣传主任。中共一大的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随后，他与陈独秀、李汉俊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创办并主编第一份党刊——《共产党》月刊。

党的二大后，李达虽然离开了党中央机关，但一直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他坚持为党工作，辗转长沙、武汉、上海、北平、重庆、桂林等地，利用三尺讲台讲授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被革命青年誉为“红色教授”。1922年，李达应毛泽东邀请，先后在湖南第一师范、湖南自修大学任教。对于李达的到来，毛泽东特别高兴，并向湖南自修大学的同学们做了专门介绍：“同学们，我给大家请来了一个大理论家，就是李达同志，既教大家书，又是学校的校长，他来了，大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一定提高的更快。”

当时，国民党出台了一系列法令细则，禁止宣传共产主义。李达冒着被逮捕和杀害的危险，以夫人王会悟的笔名“王啸鸥”的名义在英租界当局注册了笔耕堂书店。他们自己出钱，自己买纸，找人代为印刷，大胆而又巧妙地出版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不遗余力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大纲》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应运而生的，它亦是李达的代表作。整本书共四十二万字，在1937年至1939年间，共印行4版。1937年，李达冒着被抓的风险，给远在延安的毛泽东寄取了这部新著。毛泽东在延安收到李达奇去的 《社会学大纲》后非常高兴，他认真地读了 10遍，在书上作了许多批注。1938年3月的一天，毛泽东来到哲学学会与该会的同志们探讨辩证法在中国革命中的运用问题，他拿出随身带去的一本新书高兴地说：“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一本好书，这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宣传部长’，李达同志写的 《社会学大纲》，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

1948年，全国解放在即，毛泽东致函李达，邀请他北上参加新中国的筹建工作：“吾兄系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望速前来参与经营”。”信的言语十分的巧妙，随后毛泽东又三次电示中共华南局护送李达去解放区。1949 年 5 月 14 日，李达辗转来到北平。毛泽东亲赴车站迎接。按照党中央的安排，李达先后担任湖

南大学和武汉大学校长。他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贯穿到教学的各个方面。他担任武汉大学校长长达13年，亲自主持武汉大学哲学系毛泽东思想研究室的工作，对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作出了重大贡献。1951年和1952年，李达出版了《〈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两书。在写作过程中，李达每写完一章都寄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对李达的解说深表满意，称赞“这解说极好。”李达是“理论界的鲁迅”。

1966年8月24日李达去世，享年76岁。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在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上册《唯物辩证法大纲》的编写工作奋斗。

李达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武汉大学校园里有一尊李达塑像，这位党的一大召集人，慈祥肃穆的武大校长凝望着遥远的前方。而“他”的身边，年轻的学子正奋发学习，传出琅琅书声。

“力食居”背后的师生情
——毛泽东与历史老师罗元鲲

毛泽东同志的书法根植传统，又独领风骚，形成了鲜明的个人风格和磅礴的伟人风范，缔造了中国书法史上的一座新的丰碑。据统计，他从1915年在《明耻篇》上题写16字自省励人开始，到1974年春为广西大藤峡题词，一生留下的各类题词超400幅，内容广泛，几乎涵盖了各个领域。每一件墨宝不仅是书法艺术的珍品，其背后更有许多经久传颂的故事。他为在第一师范求学时期的历史老师罗元鲲居室题词的故事，就是其中之一。

罗元鲲，1882年出生于湖南省新化县敦信团利乡(今洋溪镇)寨边村，1903年考取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前身————湖南全省师范学堂，毕业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数十载。他博学多才，擅长文笔，工于辞赋，对历史、国文等学科都有很深的造诣，且著述颇丰。同时他又安于清贫淡泊，潜心教育事业，桃李满天下。毛泽东、蔡和森、蔡畅、张昆弟、陈昌、罗学瓒、李维汉、萧三、周世钊等著名人物都曾是他的学生。

罗元鲲与毛泽东结缘始于1914年春，罗元鲲受聘担任湖南第一师范历史课教师。21岁的毛泽东正好求学第一师范，直接师承罗元鲲先生。对历史极为喜好的毛泽东不仅十分敬佩罗先生的德言懿行，更为敬佩他的渊博学识和严谨学风，将他引以为求学问道的良师，经常登门聆听教诲。而罗元鲲也对这位有着远大志向又才华出众的学生极为赏识，不仅详细为毛泽东解读自己撰写的《史学研究》《中国近百年史》、《本国史表解》《通鉴讲话》等著作，更是破例将自己珍藏的《二十四史》全套借给毛泽东阅读。众所周知，在毛泽东一生中，《二十四史》无论是在他的读书生活还是政治生活中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大概是他的老师罗元鲲当初始料未及的吧。

罗元鲲不仅在读书和做学问上谆谆教诲毛泽东，在思想感情上也同自己喜爱的学生是相通的。从毛泽东早期参加的“反袁”和“驱张”等一系列实践中，都曾得到罗元鲲的支持的，留下了师生二人并肩的身影，特别是罗元鲲先生“宁做教书匠，不做糊涂官”的高尚节操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队伍上了井冈山，自此毛泽东与罗元鲲便隔绝了音讯。直到全国解放后，罗元鲲从报纸上得知毛泽东的消息，欣喜万分。他高举毛主席画像走

上长沙街头庆祝新中国的诞生，更抑制不住激动之情挥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述说了自己和原一师一众师友的近况。

让罗先生意想不到的是，新中国成立之初，日理万机的毛泽东主席在阅读他的来信后，不仅亲自致函湖南省政府主席王首道，托他派人前去慰问罗元鲲等一师先生。更让罗先生惊喜万分的是，1952年9月，毛主席更是去信邀请罗元鲲、张干以及他在韶山的私塾老师李漱清、启蒙老师邹春培的儿子邹普勋一同赴京相见。

1952年9月26日，这是罗元鲲一生都难以忘怀的日子。当接罗元鲲等人的轿车驶进丰泽园时，早就迎候在门口的毛泽东即刻笑盈盈地走上前去，同师友们一一亲切握手、问候，并始终对老师们施以尊敬礼让、躬谨谦和的弟子之礼。

师生之间追昔抚今，谈笑风生。毛主席还特意准备了几个家常小菜招待罗元鲲先生一行。席间，罗先生谈及在中南海内的见闻，特别是对建筑上挂着的匾额饶有兴趣，毛主席则一一地为其解读。这时，罗元鲲先生萌生了一个心思：如果能请到毛主席的一方墨宝挂在家里那该多好。但这样的请求毛主席能答应吗？罗元鲲心里犹疑不定。在一旁的毛主席察觉到了罗元鲲面露难色的神情，主动询问其缘由。罗元鲲终于鼓足勇气对毛主席说：“润之，我有一件事想求你，行不行？”

毛泽东笑着回答：“翰溟先生，您是我的老师，有什么事情尽管吩咐！”罗元鲲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我想要一幅你的墨宝留作纪念！”毛泽东爽朗地说道：“这好办，只是怕我的字写得不好，你不满意！不知先生想写什么？”罗元鲲连忙说道：“你的字在一师的的时候就写得好，如今更是出神入化了。可不可以请你为我的寒舍题个舍名？”毛泽东点点头：“贵府叫什么名字呢？”罗元鲲回答道：“区区一陋室，没有什么正式的名字！”

毛泽东听完老师的话后沉思良久，说道：“老师，您还记不记得有一次上课的时候讲‘自食其力’，你说自己的事自己干，靠天靠地靠父母都不是好汉！我想，贵府不如就叫‘力食居’，您看怎么样？”

“力食居”，罗元鲲低声念了数遍，猛地一拍大腿说道：“这个名字太好了，知我者，润之也！”

也就在这一刻，罗元鲲突然热烈盈眶，他没想到多年前课堂上的这件事毛泽东竟然一直记得，还深深记在了心里。一辈子教书育人的罗元鲲深深意识到为人师者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可能会影响学生一辈子，当老师不仅要学识渊博，更要以身作则，时刻给学生树立一个积极正面的榜样。而这些，又何尝不是一个老师最大的成就和幸福呢？

罗元鲲离开北京前，毛主席派人送来了“力食居”的宣纸字幅，罗元鲲小心地将这幅价值千金的纸卷收起来带回了长沙，做成了匾额，挂在了自家的房门上。此后，罗元鲲总会站在院子里，凝视着毛泽东写下的“力食居”三个字，似乎这三个字是他们师生情的纽带和桥梁，一代又一代的师生，将中国人“自食其力”的美好品格一直传承下去……

烈士彭道良：教育改革先行者

90多年前，他在家乡倡导教育改革，强调启发学生思维，废除体罚，注意学生在德智体等方面同时发展，实行男女同校……

革命年代，他为党的事业奋斗到底，为苏区学校编写教材，编辑报刊充分发挥教育作用及组织作用……

他就是中国教育改革先行者——彭道良。

彭道良，1893年生于湖南省浏阳县。叔父是同盟会会员，幼时他就读于叔父开办的卓然小学，深受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洗礼。当听到武昌首义、长沙响应的消息后，17岁的彭道良便投笔从戎，到一所工兵学校学习，为强健体魄，每次去长沙读书不坐车马，每只脚上绑5斤毛铁走路上学；喜欢撑竿跳高，曾参加上海举行的远东运动会。

1916年，他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与毛泽东、蔡和森等同学相识，和毛泽东不仅是同班同学还是同桌，一起畅游湘江，商讨国事，相互激励。毛泽东学习期间，曾登报征友，得到了“三个半回音”，彭道良就是其中之一。彭道良说过：“我在一师能有所长进，全赖良师益友的帮助。”1918年，得知毛泽东、蔡和森等在筹建新民学会后，彭道良很快就加入了其中，和跟随毛泽东一起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怀着一腔热血豪情，无所畏惧地去上下求索。为湖南地区的建党建团工作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他回到家乡担任小学校长，在任期间，他力倡教育改革。《长沙英烈》一书中就记述了他制定的8条教改措施，包括提倡白话文，使用标点符号，推广普通话等等。在教学期间，彭道良还带头脱掉鞋袜，带领师生参加种菜、砍柴、修桥铺路、养猪等社会实践活动。由于彭道良大力推广新文化、新思想，进行教学改革，家乡的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1926年农民运动兴起后，彭道良就放下了教鞭，开始组织农民协会。长沙马日事变以后，白色恐怖笼罩在浏阳上空，而彭道良却进一步加深了对共产党的认识。他找到当时的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坚决要求加入共产党，同反动派斗争到底。潘心源紧握他的双手说：“党正需要你这样的好同志!”并用“疾风知劲草，岁寒见松柏”的诗句赞扬他的革命精神。

1930年5月，彭道良根据指示在北盛、蕉溪地区筹建起浏阳第十九区苏维埃政府，当年9月又被调往浏阳县苏维埃政府文化委员会工作，负责编写苏区学校教材，同时兼任第四列宁学校校长。为了让贫苦工农子弟能入学读书，他推行各地苏维埃实行免费教育。在彭道良的精心计划安排下，浏阳县苏维埃的各类学校办得很出色，群众无不鼓掌称颂。

1932年，彭道良任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文化部副部长，兼省苏维埃机关报《战斗报》总编辑。他以极大的热情从事报刊的编辑工作。在那艰苦的环境里，彭道良克服种种困难，先用油印，后用石印，使报刊如期出版。他还把《战斗报》由周刊改为三日刊，发挥政府机关报的战斗作用。长期艰苦的工作，使他体质变差，不幸感染疟疾，但他带病坚持工作，不但审查报刊内容，而且还自己写稿。

1934年春，国民党对苏区发动反革命第五次“围剿”，每天数十架飞机狂轰滥炸。一天，彭道良正在工作时，不幸被炸伤腰部，后医治无效，牺牲于万载红军医院，时年40岁。当时几位红军战士想去掩埋他的尸体，但走到离红军医院两三公里的地方时，只听见枪炮连天，医院已被国民党军队占领，无法前往，他们只能退回。彭道良的遗体被当地群众就地掩埋了。

斯人已逝，精神永存。彭道良崇文重教、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深深影响着后人。彭道良的儿子彭早尔，十多岁就参加革命，跟着红军队伍做通讯员。孙子彭书家也跟随祖父的脚步，走上了教师岗位，直至退休。彭氏家族里还有多位同志入伍从军，为国家献出自己的一份力。

舒新城

在暗流涌动、风云变幻的近代，人才辈出,各领风骚。但大家的目光大都聚焦在政治军事和社科领域,鲜少关注出版界，即便如此出版人绝不是不起眼的沙砾。诚如陈思和所言“从事出版和教育的这群有着坚定人生信仰的知识分子，正是在两者之间走出了第三种道路，他们把理想之路归诸足下，一步一个脚印在布满荆棘的中国大地上实践着。”而被誉为“辞海之父”的舒新城正是其中一颗闪耀的明星。

1893年，舒新城出生于湖南溆浦县东乡，家里世代以佃田力耕为生，生活十分清苦。但他的母亲却非常重视他的教育，希望他将来能立于士林而不再做足茧手胝的农人。舒新城五岁便入私塾读书，1908年，才正式踏入新式学堂，此后，他又辗转求学于常德、长沙、武昌等地的学校，并幸运地考上了湖南高等师范，在湘江之畔度过了四年平静的求学生涯。毕业后舒新城选择从事教育事业，立志于研究教育学，开展教育实践并开始从事教育著述。他曾在长沙兑泽中学、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省立一中及福湘女学等校任教，仅1924年至1928年秋，前后5年多时间，他共编著了各类教育书籍17种、20册、405余万言。

纵观舒新城的一生，前半生他致力于教学实践和教育研究工作，他推行实验道尔顿制、整理中国近代教育史，在近代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他的后半生又与出版编辑结下不解之缘。1922年秋，舒新城在吴淞中国公学任教时，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逵来校演讲，两人一见如故，陆费逵有意请他主持中华书局的教科书编纂工作。陆费逵几次邀请舒新城来主持编纂工作，但舒新城都因各项事由婉拒了。1928年3月，陆费逵得知舒新城不打算去河南任教后，立即书信予舒，请他主持中华书局启动多年而搁置已久的大型辞书——《辞海》的编纂工作，信中恳切之情最终打动了舒新城，1929年舒新城与中华书局正式签定主编《辞海》契约。1930年1月1日，舒新城走马上任，开启了他人生的另一个阶段——编辑出版家的生涯。

编纂《辞海》并非易事，辞书编纂是一项重大工程，在舒新城正式上任前,此项工作已经进行了好几年了,但进展缓慢，前期工作也聊胜于无罢了，虽已编著旧稿数十万字，但其中已死之旧词既多,而流行之新词甚少。舒新城认为《辞海》不同于大字典，它以词为主要内容，书中涉及旧籍中常见词类、历史上重要名物制度、流行较广的新词、社会各业重要语汇、常见地名、重要的名人名著、科学文艺常用术语等。其中新词的确立由于没有依据更是尤其艰难，在《辞海》的编纂过程中曾经经历多日也无法释义一个新词的困境。舒新城“嘱同人遍读新书新报”,可是进展十分缓慢,“尝有竟日不得一二词者”。 在那个物资极为匮乏、飘摇动荡的年代，舒新城却带领着同伴数年如一日的坚持着，这需要何等的毅力和勇气。在他的主持下,编纂工作走上正轨,稳步向前推进。在《辞海》编撰的后期，中国对外局势紧张，《辞海》中涉及的政治性时事性条目的去留引起了编辑所内部广泛的讨论。这看似是几个词条的问题，但实则涉及到民族尊严和历史价值。当时书局里很多人都主张将政治性时事性条目删去。但是舒新城认为“我国积弱，不能与强邻抗衡，使陷我者我不与辩，已属屈辱，而彼加于我之事实亦默而不提，未免不近人情。《辞海》出版于今日，应是‘今日’的东西，绝不能单提往事而不及今日之事，尤不应不提今日人人伤心之事。”正是舒新城坚持保留条目，坚守出版“综合性大型百科辞典”的编纂初衷，在初版的《辞海》里，一大批政治词目收入其中，保持了中国人的立场，彰显了出版人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之情，正是因为舒新城的坚持使得今天我们能有幸看到《辞海》的“全貌”。

经过百余人数十年的努力，1936年，《辞海》问世，成为中国影响最大的一部汉语工具书。舒新城不是《辞海》的第一任主编,却是《辞海》任期最长的主编，解放后舒新城仍一直牵挂着《辞海》的修订。1958年，上海成立了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舒新城重进书局工作，担负起主编新《辞海》的重任。这位六旬老人用他专业的知识和严谨的态度继续坚守在编纂工作的第一线，即便到了1960年他因罹病住院，在病榻也仍卧床审稿，逐条逐句琢磨。遗憾的是，同年11月28日，舒新城终因癌症病重谢世，未能看到新《辞海》正式出版。

舒新城曾自述：以小农之子，因着遗传环境与教育环境的种种关系，体验一种“无限自觉创造”的人生见解。舒新城用一生践行了他的人生使命与责任，即便时过境迁，岁月轮转，他的名字早已与《辞海》共长存，永远活在千百万读者的心中。

岁月变迁，丹心永继——毛泽东的秘书李六如

20世纪50年代末，有一部名为《六十年的变迁》小说风靡全国，已译成英、俄、日等多种外文版本，在国内更是一版再版七次，被盛赞是一部珍贵的历史文学读物。不同于一般的历史性小说，他的作者并不是一位专职作家，而是一位从事过军事、政治、财经、文化、司法等各种工作，为新中国的建立建设做出突出贡献的国家领导人，他就是毛泽东的秘书，原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党组书记李六如。

1887年，李六如出生在湖南平江县城东街砚泉巷的一所公馆里。1908年李六如来到湖北参加新军，加入中国同盟会;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1912年入日本东京明治大学攻读政治经济科。1918年回国返乡,在启明女校任国文教员。此间他变卖家产,创办救贫工厂,自任厂长,并集资创办兴业织布公司,尝试实业救国。在遭受挫折后，他开始寻求教育救国之路。

1921年秋，李六如来到长沙，经当时省教育会负责人方维夏介绍，他来到湖南第一师范任国文教员，由此结实毛泽东、何叔衡。同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成为平江县第一个共产党员。入党后，李六如先后参加北伐战争，秋收起义。1928年冬,为了联络更多中华儿女救国救民，他前往新加坡从事革命活动,任中共南洋临委宣传部长。

1930年，李六如回到中央苏区，任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总行副行长，代理行长。在此期间，他利用在日本留学时专攻的经济学科,发挥自己所长,为统一苏区财政,整理税务,建立国家金库和开辟财源,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1932年7月，开始发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自己的货币,扭转了以前财经上的混乱状况,巩固了苏区的政权建设，被美国记者斯诺誉为“中国的奇迹”。

1934年红军长征后，李六如留在根据地，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在一次转移途中,不幸被捕。在狱中，李六如忍受了酷刑的折磨,没有吐露半点党的机密。直到西安事变后，经过党的大力营救才出狱。

1937年，从南京辗转到达延安的李六如，在杨家岭的窖洞里，见到了他日夜思念的入党介绍人毛泽东。一见面，李六如激动得热泪盈眶。毛泽东紧紧握着李六如的手，眼睛也湿润了。他动情地说：“ 六如同志，你受苦了。瑞金一别就是3年，你在国民党监狱里就蹲了2年。如今，我们终于见面了。”“ 你的情况我都知道了…… 你就留在我办公室当秘书长吧！”就这样，李六如被调任到毛泽东主席办公室任秘书长，一直到1940年5月。担任中共中央秘书处长的王首道后来回忆说：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李六如坚韧不拔的工作,参加了很多中央有关政策问题和历史问题的研究与决策,出色地完成了毛泽东交给的各项任务,为争取中华民族抗日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李六如调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中央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和党组书记。

建国初期,百废待举。人民检察工作,从无到有,面临着艰巨的任务。李六如抓紧钻研检查、政法方面的任务,认真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对社会主义司法、检查工作做了卓越贡献。《检察制度纲要》就是已过古稀的李六如的心血之作。虽然只有18页不足1万字，但这本小册子却是新中国检察理论研究的开山之作，具有里程碑意义。在这本小册子里，新中国第一次权威地回答了：新中国的检察制度属何种类型、性质、 职能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和旧中国检察制度的本质差别， 以及如何因时因地地发展我们的检察制度。

在笔耕不辍的岁月里，李六如惊奇地发现,他的一生竟同中国革命历程如此合拍,息息相关,自己就像革命洪流中的一滴水,记录着中国革命几十年的变迁。因此,他产生了一个念头,将这一切宝贵的资料留给后人。于是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李六如开始收集整理有关资料,直到1956年才开始执笔写作,这就是开篇提到的《六十年的变迁》。

1973年，李六如在北京因病去世。他一生勤勤勉勉,始终怀揣一颗赤诚的对党、对人民、对革命事业的耿耿忠心,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坚定、毅然而行。他的一生充满了曲折,闪耀着让世人无限敬仰的灼灼光辉：一身正气向青天,丹心永继感后人。

田汉：以笔为枪 为国而歌

有一首歌，只有84个字，但字字都饱含着一个民族英勇顽强的斗志和热血。

有一首歌，只有104个音符，却声声都会从心底拨动亿万国人的骄傲和自豪。

他就是由第一师范杰出国文教员田汉作词，著名音乐家聂耳作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

一个耕耘三尺讲台的先生是怎样和国歌结缘？国歌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让我们一起走进田汉以笔为枪，为国而歌的壮丽人生。

田汉是我国著名的戏剧活动家、剧作家和诗人。他的一生笔耕不辍，为人间正义放歌，创作了60多部话剧歌剧，20余部戏曲，近2000首歌词和诗歌，被誉为中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人。

田汉从小就是个戏曲迷。他1898年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果园镇的一个农民家庭，原名田寿昌。父亲早逝，勤劳的母亲节衣缩食送他求学，从家乡的私塾到长沙的新式学堂，他在革命的浪潮中开始接触新思想，并更名为田汉，表达救国之志。

他小时最喜欢去家附近的庙会看戏班子演出，无论湘剧、京戏还是皮影戏，他都看得精精有味。14岁那年，田汉写了一个小戏曲《新教子》发表在《长沙日报》上，虽词曲稚嫩，却让田汉从此与戏剧结下不解之缘。

18岁那年，田汉东渡日本钻研外国文学戏剧，并加入少年中国学会。1921年回国后，他怀抱教育救国之志来到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担任国文教员，与同在一师任教的毛泽东相识。一年后，田汉前往上海从事戏剧创作，创办了《南国半月刊》，并相继发表了《获虎之夜》等剧本，揭开了话剧史上著名的南国戏剧运动序幕。整个20年代，田汉在恶劣的社会环境中坚持创作，并逐步明确了文学、戏剧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方向。他在作品中大声疾呼：“大家都起来！被压迫的人们，集合起来，一致打倒我们的敌人，一致建设新的理想，新的光明！”1932年，田汉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4年，红军开始长征，北上抗日。田汉以笔为枪，勇敢地奔赴前线参加各种救亡宣传活动。他满怀激情地创作了宣传抗战精神的剧本《风云儿女》，并酝酿为影片谱写一首能激发中国人民的抗战斗志和救亡决心的歌词。

此时的中国山河破碎，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田汉曾亲眼目睹了法西斯的嚣张

气焰和红军将士们用血肉之躯与敌人奋战到底的壮怀激越，家国情怀、时世忧患激发了田汉诗人的敏感和革命者的担当，歌词如地底燃烧的熔岩喷涌而出：“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血肉来筑我们新的长城”！田汉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将歌词命名为《义勇军进行曲》，他仿佛听到这些奔腾燃烧的词句汇集成了硝烟中吹响的号角，他仿佛看见无数中华儿女高唱着这样的词曲，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无畏和坚毅。

正当田汉准备将歌词进一步完善的时候，1935年2月19日深夜，国民党特务以“宣传赤化”的罪名对田汉进行了抓捕。田汉临危不惧，他一边与敌人周旋，一边悄悄地将歌词初稿记录在一张包装香烟的锡纸衬底上。

几经辗转，这份歌词转交到了音乐家聂耳的手中。聂耳与田汉早年相识，基于共同革命理想的二人并肩创作了《毕业歌》等大量的爱国作品。聂耳拿到这份来之不易的歌词，顿时被蕴藏其中的革命激情所震撼，他仅用了两天时间，便将谱曲一气呵成。1935年5月24日，随着电影《风云儿女》的上映，这首充分表达了全国人民团结抗日、救亡图存的《义勇军进行曲》迅速唱响在中国大地。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都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这是中华民族愤怒的呐喊，是中国革命铿锵的号角，是中华儿女奋起反抗的战歌。这首歌伴随着救亡运动的巨浪，抗日战争的烽火，解放战争的硝烟唱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新中国成立前夕，经党中央认真商议，《义勇军进行曲》选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从此，只要有国歌唱响的地方，就有中国人最赤诚的热爱和自豪。那是奥运健儿在国际赛场上的屡屡夺冠，那是卫星升空、飞船登月的捷报频传，那是菁菁校园里面向国旗唱响的凌云壮志，那是中华儿女血液里家国相依、奔流不止的生命之歌。

而田汉的名字也连同这首催人奋进的乐章永久地篆刻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

为党献身，死而无憾——陈昌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1917年，毛泽东用这句话描述了他与陈昌两人之间深厚的革命情谊。陈昌是何许人也？为什么毛主席一直难以忘怀？

这得从青年时期的毛主席说起了。毛主席认为，人不可能单独一个人取得成就，结交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奋斗，是至关重要的大事，于是，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的毛主席不但重交友，更为特别的是交友之奇：朋友间不谈金钱，不谈男女之事，不谈家务琐事，只愿意谈论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就这样，一师毕业时，毛主席周围真的聚集起一批奇友，看起来无特别之处，却个个胸怀远大，有救苦救难、救国救民之志。在众多的奇友当中，最让毛主席难以忘怀的便是——陈昌！

1894年，陈昌出生于湖南浏阳市镇头镇的一个贫苦家庭，在封建地主的压制下，陈昌一家过着食不果腹的生活，尽管如此，他的父母深知，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于是，省吃俭用的父母在陈昌10岁的时候将他送入私塾读书。

陈昌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读书期间深受老师喜爱。1911年，勤奋好学的陈昌顺利考入湖南第四师范。在求学期间，陈昌认识了同在这所学校学习的毛泽东、何叔衡、蔡和森。陈昌比毛泽东小半岁，毛泽东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远大抱负和独立思考、勇于进取的学习态度，以及善于交际、联系群众的活动能力，令陈昌极为钦佩，他们很快成了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当时，蔡和森、何叔衡、罗学瓒、张昆弟等也在一师读书，且都通过毛泽东团结在一起。他们经常纵论天下大事，讨论国家命运和前途，并成立哲学小组专门研究新思想、新文化，探求革命真理。

对于陈昌，毛泽东一直认为他就是个奇人，毛泽东在后来回忆道：陈昌的口才十分了得，在一师读书时，他的演讲才能闻名全校，常见清早起床后，独自一人跑到湘江猴子石旁，以滔滔江水为千百听众，旁若无人地大声练习演讲，而且绘声绘色，顾盼神飞，吸引了不少路人驻足欣赏。因是学校辩论会的积极组织者和领导者，人称他为“雄辩部长”。

陈昌对于学习的痴迷和刻苦程度，世人更是难以想象，陈昌根本没有业余时间，他除了与我们这些挚友谈论革命理想外，其余时间都在学习或者读书。陈昌拿这样一句话勉励自己：人不能天生聪明也，发愤就是聪明。人一知之，吾十可知也，人十知之，吾百可知也。

对于陈昌的刻苦，恩师杨昌济曾经这样评价：阅熊萧陈三生笔记，均有长进，昆甫多记读书讲论所得，子升多记思虑所得，章甫多记行事所得；一重博学，一重深思，一重力行。杨昌济认为，三人的日记，只有陈昌的日记最有特点，他是一个更重行动的人。

1915年新文化运动前后，国内反对袁世凯的革命活动风起云涌，为了声援革命活动，身在湖南第一师范的毛泽东第一次有了组建革命团体，联合更多有志之士的想法，对于这一想法，志同道合的陈昌积极赞同。毛主席与陈昌等人在湖南第一师范合影照于是两人开始具体谋划，为了招募有识之士，毛泽东还专门以笔名二十八画生发出征友启事。征友启事的内容如下：二十八画生者，长沙布衣学子也。但有能耐艰苦劳顿，不惜己身而为国家者，修远求索，上下而欲觅同道者，皆吾之所求也……

1918年4月，酝酿多时的新民学会正式成立，陈昌是“干事”之一。一边从事革命活动，一边教书。陈昌把地理知识与时局结合起来，给学生讲解中国是如何被帝国主义列强一步步瓜分的。在自编的教材中，他呼吁：“尚志沙场，誓图恢复，山河依旧，不难一一收回，庶可以绍祖先之丕烈，洗百年之奇耻也。”1921年，陈昌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在苏联的帮助下，国共实现第一次合作，陈昌当选为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随后被派往湘西动员贺龙出兵北伐。当时，军阀孙传芳和吴佩孚也派了人，贺龙设宴请三方陈述理由。陈昌充分施展雄辩才能舌战军阀说客，最后促成贺龙率兵北伐。1927年，蒋介石阴谋发动叛变，破坏国共合作，大肆屠杀共产党人，正在贺龙部队的陈昌知道后悲痛不已，北伐战争结束后，陈昌跟随贺龙一同来到了南昌，在南昌起义中，陈昌再次发挥他的演讲才能，积极宣传共产党的革命思想，贺龙队伍的进一步壮大，陈昌可谓是立下了大功。南昌起义结束后，陈昌按照党组织的要求继续宣传革命，于是他离开了贺龙的队伍。

1929年，党组织交给陈昌一个重要任务，要求他以特派员的身份奔赴江西，再次与老搭档贺龙合作，一同在江西开辟革命根据地。陈昌听到这个任务后高兴不已。他曾说过：能够和老搭档贺龙一起共事，是他人生一大幸事。然而，在前来江西的途中，他遇到了曾经接济过的的学生，这些学生早已经成为国民党的特务，他们利用陈昌的心理，最终将他诱捕。国民党深知陈昌的才能和头脑，多次希望他能够为国民党所用。面对国民党的威逼利诱，陈昌不为所动，为了让陈昌就范，特务们特意抓来了陈昌的妻子和女儿，希望通过他的妻女能够逼迫陈昌就范。然而，陈昌对共产主义的

信仰超乎了特务们的想象。在就义前，陈昌坚定地对妻子说：“献身党的事业是我的生平志愿，今日我为党的事业而死，正是死得其所，死而无憾！

1930年2月12日，毛泽东永远忘不了这一天，这一天是挚友陈昌英勇就义的日子，陈昌被特务们残害于长沙浏阳门外。

临死前，陈昌依旧用自己的演讲，积极宣传共产主义信仰和党的思想路线。为狱中的战友们播下了革命的种子。他严厉痛斥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号召人民起来与国民党作斗争。临刑前振臂高呼：“革命一定成功！劳苦大众一定要解放！”他是陈昌，他为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一生。

伟人恩师杨昌济

1936年，在延安窑洞的幽幽烛光里，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起了自己的求学生涯：“在一师学习期间，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联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是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的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从主席的话音里，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份深深的思念和尊敬。下面，我们来一起认识下，这位主席的恩师，杨昌济。

一、求学之路

杨昌济，字华生，又名怀中。1871年4月21日，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县板仓冲。因为世居板仓，祖父和父亲都是教书先生，外公还是清朝的进士。因此，杨昌济从小就接受了非常好的传统教育，精通理学诗经。后来被尊称为“板仓先生”、“板仓杨”。早年开过私塾、参加过科举。当时正值光绪年间，内忧外患，他深切感受到，书生报国的最好方法，就是学习先进的思想，用教育改造国民。1903年开始，他先后去了日本和英国求学，还曾前往德国实地考察，对于国外人民的生活习惯、教育体系以及法律法规等都有深入研究。

二、归国任教

1913年，在外十年的杨昌济学成归来回到了湖南。当时，军阀谭延　登门拜访杨昌济，要聘请他出任湖南省政府教育司司长。他断然谢绝,表示要专心从事学术研究和教育事业：“以直接感化青年为己任,意在多布种子,俟其发生”。

1914年，杨昌济在湖南第一师范兼任修身、教育两学科教员。他决心将自己毕生所学教育学生，用新思想去灌溉新青年。正因为他饱读中国四书五经，又有过西方现代思想教育理念的熏陶，因此他的讲课常常能中西合璧，输出一种新的思想观念。他教授哲学、伦理等等科目，既追求经世致用、又探索民族大义。谈到个人修身，他提倡德智体全面发展。他上课抑扬顿挫，慷慨激昂，常常以爱国、进步和改革的观念教育学生，劝年轻人要为中国崛起而奋斗。这样的思想理念很受青年学子们的喜欢，因此他的课上总是座无虚席。这当中，最有名的学生，是毛泽东。

三、主席恩师

1915年，22岁的毛泽东成了他的学生。初入学时期的毛泽东有些迷茫，不知如何实现心中抱负。杨昌济了解到毛泽东内心的困惑，主动找到毛泽东，为他分析当前国内形势，指出“非变法无以图存”，让毛泽东明确了方向。当时，毛泽东洋洋洒洒写了一篇一万多字的序文，笔锋苍劲，文字流畅，让杨昌济看后啧啧称赞。忍不住看了一遍又一遍，最后挥笔给了100 分。然后又捧起来看了一遍，感觉100分都不足以表明这篇文章的优秀，又给加了5分。杨昌济在日记中写到：“毛泽东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

在一师范求学期间，毛泽东经常穿一件灰色的长衫，天冷了便在里面加一件毛衫。他最经常去的地方是学校图书馆，平时也不爱跟人开玩笑。1915年，年轻气盛的毛泽东因为看不惯校长张干的行为，带领一群学生一起驱赶校长，由此彻底惹恼了校长，非要将毛泽东开除不可。杨昌济毫不犹豫站出来力保毛泽东，后来在他以及徐特立等人的支持下，这事才不了了之。杨昌济劝导毛泽东不用太过激进，急于求成。同时，他更器重毛泽东的这份胆魄。在这个年轻人身上，他看到了自己渴望已久的救国抱负，也许能在这个年轻人身上得到传承。

杨昌济是中国第一位提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家，他认为知识可以报国，但如果没有强健的身体，没有高尚的品德，报国就是空谈。他带头践行了这一教育理念，长年坚持洗冷水浴。这一习惯也影响了毛泽东。寒冬时节，他用冷水擦身；大雨滂沱，他在野外奔跑；江水滔滔，他去搏击风浪；他甚至琢磨出一套强身健体的广播体操，四处推广。1917年，随着新文化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杨昌济向《新青年》杂志推荐毛泽东的作品《体育之研究》。这是毛泽东平生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他提出了一个颇为新鲜的口号：“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他列举大量中外名人事迹，说他们之所以成就大业，都是因为身健气雄之故。伟人的思想和气魄在这篇文章里崭露头角。事实证明，杨昌济眼光很准。这位被他高度肯定的学生日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和改变中国命运的领袖，而杨昌济，则是毛泽东的“伯乐”。

在那个革命年代，青春的聚散，犹如人生的云朵，这一朵云和那一朵云在时代之风的吹拂下相聚了，又在时代之风的吹拂下分开了，各自带着往事的回忆，各自带着远大的抱负。唯一能够将他们聚拢的，是青年时代塑造了他们价值观的启蒙导师。1918年，毛泽东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了。他结束了五年半修学储能的学生时代。此后，他再也没有进学校读过书。这年，他二十五岁。可以说，人生的第一粒扣子，源

自一师。人生的启蒙导师，源自一师。中国未来进步的思想，源自一师。

四、桃李天下

1918年6月，在湖南任教四年之后杨昌济应蔡元培之聘，举家迁居北平任职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也是在1918年，刚毕业的毛泽东开始筹备新民学会，杨昌济得知后，专门致信表示支持。起初新民学会共有21名会员，其中20人都是他教过的学生：毛泽东、何叔衡，一起作为湖南的代表，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成为党的创始人之一。蔡和森、李立三、向警予、李维汉都是党的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

1918年8月，为了筹措新民学会赴法勤工俭学的事，毛泽东到达北京，第一件事便是到杨昌济家里拜会恩师。杨昌济看到自己的爱徒穿着寒酸，居无定所，没有固定工作。当即便决定为他找份工作，于是他找到同在北大教书的好友李大钊，让他帮毛泽东安排一份工作。就这样，在杨昌济的帮助下，毛泽东被安排进北大图书馆工作，每月8块大洋。在这里，他有机会听到杨昌济、李大钊等名师的讲课，还可以在上班期间阅览图书馆里各种不同的书籍，这对于急于汲取知识的毛泽东是十分幸运的。也就是在这里，毛泽东和杨开慧相识相恋，日后两人喜结连理。但可惜这一切，杨昌济都没有能看到。

1920年1月17日，杨昌济在北京德国医院病逝，享年49岁。临终前他写信给好友章士钊，推荐毛泽东和蔡和森等人。信中说：“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这是他最后能为这些爱国青年所做的事。

“欲栽大木柱长天”这是杨昌济先生的名言，他用毕生所学教书育人，影响一个时代的进步青年，培育出无数革命志士，在中国革命道路上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虽然老先生英年早逝，但老先生以“欲栽大树柱长天”为核心的教育经世的目的和宏愿却是成功了，他成功地培养了一批“柱长天”的“大树”。

杨树达

1955年2月初的一天，湖南师范学院教授杨树达从邮递员手中接过一封寄自北京的挂号信，他欣喜地打开信笺，赫然发现这封信竟然是毛泽东主席写来的亲笔信，只见上面写道：

遇夫先生:

惠书及大著数种收到，甚谢！尊恙向愈，极慰。待完全康复之后，欢迎先生来北京一游。

顺致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五年一月廿十九日

同年中秋节，杨树达来到了中南海。在中南海小湖里，毛泽东亲自掌船，师生两人再续往事，度过了一个快乐的中秋节。

1885年，6月1日，杨树达出生在清末一个书香门第家庭中。杨父在读书上对他颇为严厉，年少的他常常在家中书房读书，幼年的杨树达便开始接受中国传统教育的熏陶。不久全国开展西方新式教育的兴潮，杨树达又系统学习了算学、英文、历史、地理等杂类科目。那时候，清王朝开始变革图强，外派留学成为不少官僚家庭的最优选择，20岁的杨树达同样被父亲送往日本留学。

在日本京都第三高等学校，杨树达主要攻读外国语言学。留学六年归来后，杨树达顺利进入湖南教育司任职。

1913年，杨树达进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教授文字学。这一年，毛泽东同样进入了这所学校。第二年，湖南省立第四师范、湖南公立第一师范学校两所学校合并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老师杨树达、学生毛泽东同样转入了新学校。毛泽东和杨树达的相识，大概就是在湖南第一师范这段时间的事。那是1918年6月，毛泽东从一师刚毕业，杨树达即来到该校任教，二人相识后相互仰慕，二人因志趣相投，往来愈加密切，逐渐成了一种介乎亦师亦友之间的关系。毛泽东常常前往杨树达老师的房间请教日本国事。

1919年5月，暴发了中国近现代史上最有影响的五四运动。当时主政湖南的军阀张敬尧作恶多端，弄得湖南民不聊生，1919年底湖南爆发了驱张运动。据杨树达

1919年的日记记载：“湘省督军张敬尧行为不法，蔑视教育。学界人人愤慨，发起驱张运动，推举余及罗教铎为入京代表。十一月，余偕罗君入京，到国务院请愿，当局不顾也。”他们出发去北京那天，前去送行之人，都有惜别之容。杨树达慷慨而言：“义无反顾，事在必行，吾意决矣。”12月上旬毛泽东、杨树达又率领着驱张代表团前往北京请愿。他们两人一度盯着枪火在北京街头抗议请愿，一定要将张敬尧赶出湖南。经过一年多的时间，“驱张运动”终于取得了胜利，军阀张敬尧选择退出湖南地界，结束了这次武力入主湖南主政的荒唐闹剧。

1921年，这一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日子。毛泽东和自己的恩师杨树达也开始选择分道扬镳，一个投身革命，一个致力于中国的文字教育改革。五四运动以后，杨树达潜心学术研究和教学，一度赴京任教，任北京师范大学和清华大学教授。后返湘任湖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曾被授予中央研究院院长之职。新中国成立后，新中国成立后，杨树达继续从事语言教学和古文字研究工作，先后任湖南大学教授、湖南师范学院教授，担任过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湖南文史馆馆长、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及全国政协委员。

1955年1月，杨树达给毛泽东写信，同时寄去自己的几本著作。信中提出欲上北京与毛主席叙旧。毛主席获信后亲笔回复，欢迎他"来北京一游"，但须杨树达病愈后方能动身。此后毛泽东又与杨树达有多次书信往来，在毛泽东的关怀下，杨树达先生老当益壮，竭力从事古文字学的研究与教学。1955年杨老还参加了现代汉语规范化学术会议，承担了哲学研究所笺注《盐铁论》的课题。回湘后，杨树达不顾身体有病，更加勤奋地笔耕不辍。原定为期一年的工作，在短期内即初步完成，只剩下最后的加工润色了。1956年2月，杨树达突患脑溢血和消化道出血，遂卧床不起，口不能言，完全处于昏迷状态，昏迷中，杨老突然迸发出断续而模糊的声音：“我……还有……事情……要做呢！”这是指《盐铁论要释》的最后润色工作而言。这是他老留在人间的最后一句话。在病魔与死神的胁迫下，他在抗议，他不甘屈服，他不能接受病魔强加给他的休息。

1956年2月，杨树达先生病逝于长沙，享年71岁。毛泽东获悉这一不幸消息后，深为叹惜：杨先生的逝世是我国社会科学界的巨大损失。一字一字去破解语言文字奥秘，一生不辍，履专家之真义。这是杨树达一生的追求，他治学严谨，笔耕不辍，撰写了大量的论文，出版了十余部重要专著。他在对古代语言文字、经史群书的研究上，有着精辟透彻的阐释，解决了许多前人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为后人整理我国的文化遗产扫除了许多障碍。

一代语言文字宗师——黎锦熙

1949年6月17日上午，一辆红旗牌黑色轿车从中南海驶出，向位于北京市和平门的北师大“尚志学会”教职工宿舍方向驶去。此时，北师大职工宿舍小院古木参天，郁郁葱葱的枝叶在初夏的阳光下显得格外明媚清亮，生机勃勃。树下，一位年近花甲的老人正翘首盼望着一位特殊“贵客”来访。大约10点左右小车缓缓开进，从车上下来一位身材高大的客人，只见他笑容满面，大步迎上去紧紧握住老人的手，不禁饱含深情地喊出一声：

“黎老师！”

老人的眼泪瞬间打湿了眼眶，激动地说：不敢不敢，莫要这样喊罗。“望着眼前熟悉的场景，往日的种种又浮现在老人的脑海里，让他久久不能平静。

这位“贵客”就是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而这位老人就是毛主席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的历史老师，我国现代语文教育学的奠基人，现代汉语语法的鼻祖——黎锦熙。他和毛泽东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师生情谊，给后人留下了许多令人感动的佳话。

黎锦熙，字绍西，1890年出生在湖南湘潭县一个官宦家庭，父亲黎松庵是清代的贡生。出生在这样的家庭里，黎锦熙自幼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15岁那年，他不负众望考取了秀才，却成为中国最后一届秀才。

童年与少年时代，国家的内忧外患给黎锦熙幼小的心灵带来了不小的震动，伴随着一种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忧患意识，他不再只埋头于古文经典，转而开始关注国家命运，渴望为国为民，做一番事业。

1906年，在进步思潮和民主运动的影响下，黎锦熙和志同道合的友人发起了“德育会”，号召“牺牲个人，努力救国。”但是后来他们的活动失败了，为了暂避风头，黎锦熙从长沙逃回了家乡，之后他又辗转求学，考入湖南优级师范学堂史地部。

在那个国家风雨飘摇的时代，许多有志之士都在为国家寻找出路。他们有的投身政治，有的投身军旅，有的专注科学，而黎锦熙立志于教育事业。自22岁那年从湖南优级师范学堂毕业以后，他就开始了将近70年的研究教育事业。这既是他的兴趣和专长，也是他的救国之路。

1913年，黎锦熙来到湖南省立第四师范任历史教员，这一年毛泽东也考入了第四师范。1914年春天，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和湖南第一师范合并，改称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从此，他和毛泽东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黎锦熙讲课生动，知识渊博且平易近人，经常乐于帮助好学上进的青年，毛泽东十分钦佩他，对他的人品和学问更是非常的崇敬。

1915年毛泽东在给朋友的信中说道：“吾于黎君，感之最深。盖自有生至今，能如是道者，一焉而已。”在这封信里，毛泽东不仅把黎先生看作是自己的师长，而且是当做自己志同道合的朋友，对他的赞赏溢于言表。

1915年前后，杨昌济、黎锦熙等几位老师都住在一师外面的李氏芋园。毛泽东、蔡和森等学生常常去李氏芋园向黎锦熙，杨昌济等老师求教。他们既讨论治学的方法，讨论学问上的事情，也讨论国家大事。在黎锦熙等优秀老师的帮助下，毛泽东和同学们一起组织了“哲学研究小组”，研究哲学问题。

那年4月的一个星期天，春光明媚，一派生机。 毛泽东和蔡和森等几位朋友约定一起去拜访黎先生。当时黎锦熙正在家里备课，听到毛泽东来访，非常高兴地把他们迎到了书房里。一群人围坐在一起讨论治学方法。黎锦熙认为：“治学贵在勤与恒。勤就是勤奋刻苦，要勤看勤问勤写勤思考，恒就是持之以恒，不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黎先生的话让毛泽东感同身受，他用自己的亲身体会谈到，学习必须要从一点一滴开始，日积月累终有收获。

7月的一个星期六，黎锦熙晚饭后在校园内散步。走着走着他发现，一间教室亮着灯光，心里好奇：是谁周末不休息还在挑灯夜读？走进去一看，原来是毛泽东。他正在专心致志地写着读书笔记。毛泽东看到黎先生赶紧让座。两个人推心置腹地交谈起来，全然不顾炎热的天气和频频袭扰的蚊子。黎锦熙拿起毛泽东的读书笔记，仔细的阅读了他写的内容，不禁被毛泽东这种忧国忧民的远大抱负，以及他流畅的文笔吸引，大加赞赏。

这天晚上他在日记中写道：

“7月31日星期六晚在润之处，观其日记。甚切时，文理优于章甫，笃行二人略同，皆可大造。”

像这样两人相互探讨的事情还有很多。黎先生从14岁开始就写日记，坚持了70多年，几乎从未间断。他的日记中仅对1915年4月到8月之间，毛泽东和他交往就有19次

之多。哪怕1915年他赴北京任职，这对师生、挚友的书信也并间断。解放后黎锦熙更是完整地珍藏了毛泽东写给他的六封书信，这些书信跟随他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辗转西北、西南，成为他们亦师亦友情谊的最好见证。

1918年，为了筹备留法勤工俭学，毛泽东第一次来到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在这期间担任北京大学图书管理员，阅读了许多李大钊先生的关于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对马克思主义有了初步的接触。

在北京安定下来后，毛泽东去拜访了黎锦熙先生。黎锦熙仍是那样诚挚地对待毛泽东,并经常到毛泽东的住处嘘寒问暖。他知道毛泽东工资微薄,生活清苦，便给予他多方照顾，每逢星期日毛泽东来家聚谈时，黎锦熙都会准备一顿丰盛的饭菜，让毛泽东打打“牙祭”。1919年春节，黎锦熙把毛泽东请到家里一起包饺子，使毛泽东度过了平生第一个具有北京风味的春节。

五四运动爆发后，毛泽东回到湖南，创办了《湘江评论》，每次出一期，他都马上寄给黎锦熙先生。他们虽然见面越来越少，却始终互相关心着对方。

在毛泽东追寻救国道路的同时，黎锦熙也在自己热爱的教育事业上倾注着自己的心血。在北京工作期间，黎锦熙积极地倡导并组织了“中华国语研究会”，推行“国语统一”和“言文一致”。

1920年，黎锦熙和同仁一起创办了北京第一届国语讲习所。从这以后，他逐渐在北京各个高校开设国语文法课程，培养了大量的语言学人才，逐步奠定了我国语言学教育的基础。

1923年，黎锦熙和钱玄同等11人组成了“国语罗马字拼音委员会。”他们共同拟定的《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奠定了现行《汉语拼音方案》的基础。他提出的铸造汉字注音铜模，在1935年得到了实行，对扫盲运动和儿童识字的帮助很大。1934年，黎锦熙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研究会导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以后，他跟随学校搬迁到西安，继续他的教育事业。

1945年，黎锦熙同其他几个人倡导并成立了九三学社，在他的影响下一大批优秀的学者加入，立志要用专业知识为国家做贡献；他还不断地做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的工作，积极营救被捕的地下党员，掩护进步学生，并且公开发表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意见。蒋介石为了笼络人才，派人送给黎锦熙一张飞机票，希望他去台湾，被他严词拒绝。北平和平解放以后，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迁进了北京城。黎锦熙得知消息后非

常激动，他特别想再见一见他的学生和挚友毛泽东。

没过多久他就得到消息，毛主席要来看望他。这就是故事前面所提到的那一场景。多年没见，昔日追寻救国之路的青年学生已经成为了一党领袖，一国主席，作为老师的黎锦熙心中的感情无法言说。

那一声“黎老师”，更是让他激动的留下了眼泪。

之后，毛主席亲自掏钱办了两桌酒席，请北师大的教授们入座，他拉着黎锦熙坐在他的身边。师生二人谈了几十年来各自的情况。席间，毛主席真诚地说：“建国伊始，百业待兴，急需要大批的人才，你们任重而道远啊！”黎锦熙点了点头，心中想着，这也正是自己的愿望啊！

也就在这一年，黎锦熙和吴玉章共同发起了“中国文字改革协会”。为了满足广大群众学习政治和文化的需要，他又先后主持编写了《学习词典》、《汉语词典》等书籍。

自从北师大见面之后，毛主席十分关心黎先生的工作和生活。经常接黎锦熙到中南海谈话。两个人就像当年在一师那样，从国家大事到生活琐事，无话不谈。

1949年10月1日，黎锦熙受毛主席之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看着万众欢腾的情景，黎锦熙知道，自己的学生实现了他当初的志向，中华民族终于真正地站起来了。

解放初期，毛泽东曾经想请老师在政府部门担任实职。黎锦熙以身体状况不佳为理由，婉拒了他的好意。黎锦熙一生从事教育，早年间，他就确立了“终身只为文字改革”的志向。如今国家安定，他更想发挥所长，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自己的努力。毛主席了解到了他这一份苦心，知道他潜心教育，就支持他的决定。黎锦熙为汉字改革殚心竭虑，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正如1958年，周恩来总理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这一报告里说的：“黎锦熙、钱玄同等人制定的国语罗马字母的功劳是不能不承认的。”

除了工作上，毛主席在生活上，也尽可能地照顾关怀这位曾经的老师。建国后日理万机，他常常因为抽不开身无法去看望，就派自己的秘书代为看望。 对于毛泽东的关怀，黎锦熙感到无以为报，只能加倍的工作，更多地奉献教学和科研成果。

1976年对于黎锦熙来说是最沉痛的一年。先是周恩来逝世，他在悲愤难忍中写下了《周恩来哀辞》一首。没过几个月，毛主席逝世的噩耗传来，对黎锦熙来说尤如五

雷轰顶，他好几天茶饭不思，没过多久就病倒了，身体越来越衰弱。

一年以后，黎锦熙在书房里不小心摔倒后，再也起不来了。1978年，黎锦熙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但他一生投身教育，致力于祖国的语言文字工作规范、推广的精神永远值得铭记；他和毛主席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师生情谊依然永不褪色，感召后人！

故宫博物院首任院长——易培基

抗战初期，一则故人病逝的消息传到延安的窑洞，毛泽东得知后深感痛惜，他对美国记者斯诺说了这样一番话：“易先生是个好人啊，他帮过我毛泽东好多的忙”。主席所说的这位好人“易先生”，就是近代著名的教育家，曾担任过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故宫博物院首任院长的易培基。

易培基1880年2月出生于湖南长沙。他从小学习勤奋，聪颖过人。父亲是清朝武官，曾在湘西办案的时候被牵连入狱。年仅16岁的易培基替父申冤，写了一篇文词婉约的诉状，感动了办案官吏，让父亲获得赦免，一时传为佳话。后来，他在湖北方言学堂上学，毕业后去日本留学。虽然是一介书生，但易培基有着极强的革命情怀和报国之志，他加入了同盟会，参加了辛亥武昌起义，做过民国副总统兼湖北都督黎元洪的秘书。1913年“二次革命”时，他对黎元洪倒向袁世凯不满，便一走了之，回到湖南做起了教书先生。

1916年春，易培基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本科一部三年级国文教员。当时，毛泽东是他的学生。易培基讲课生动，注重把先进的革命思想融合课堂内容，深受毛泽东等青年学生喜欢。而品学皆优的毛泽东也成了易培基心中的“可造之材”，无论是在学习生活上，还是在以后的“罢学驱张”运动等革命活动中，易培基都给予毛泽东很大的帮助，成了名副其实的战友。1920年9月，被任命为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的易培基，聘请毛泽东先后担任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主事(校长)、第一师范国文教员兼一个班的级任(班主任)。期间，易培基不但在经济上支助毛泽东传播马克思主义和从事建党活动，还亲自为毛泽东等进步青年创办的文化书社题写社名，积极出面邀请姜济寰、方维夏、朱剑凡等社会名流参加活动以扩大影响。后毛泽东和方维夏相继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俄罗斯研究会，易培基再次出面联络当地政学两界著名人士担任发起人，吸引青年学生参加。中共早期党员熊瑾玎、何叔衡、陈章甫、郭亮、周世钊、夏曦、肖述凡等一师范学生均成了研究会的骨干力量。解放后，毛泽东曾对老同学周世钊感慨地说：“我那时能在一师范搞教育，还能在军阀恶势力下宣传马列、组建党团，多亏易培基先生这个后台老板硬哟!”

1924年后，易培基先后担任广东大学教授、女师大教育维持会会长、校长和教育总长等职，与鲁迅等人积极支持学生运动。鲁迅评价他说：“易先生的学问、道德，

尤其是主持公道，同恶势力斗争的勇气，是本会同人素来钦佩的……”1927年，经国民党元老李石曾的推荐，国民政府任命易培基为上海劳动大学校长。从此，易培基成为国民政府官僚，进入孙中山的革命阵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易培基“入阁”，当上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行政院农矿部长。1928年，国民政府决定3月12日孙中山逝世纪念日当天，在全国各地举行植树活动，由易培基执掌的农矿部负责抓落实。易培基以部令公布《总理逝世纪念植树式各省植树暂行条例》，发起“造林运动宣传周”，植树造林蔚然成风。学者评价说，“将孙中山逝世纪念日改为植树节，为宣传孙中山开拓新的场域，动员民众参与，从而扩大纪念日的社会影响，可谓一举两得，两全其美。”

1924年，溥仪被冯玉祥所率领的国民军驱逐出紫禁城，北洋政府下令成立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易培基担任委员，负责故宫的各项事宜。由于各路军阀明争暗斗，都想控制故宫，清室善后委员会面临着激烈的斗争，故宫博物院的筹备举步维艰。在易培基的努力之下，排除万难清点故宫文物、确定博物馆的名称、起草《故宫博物院临时组织大纲》、《故宫博物院临时董事会章程》等，最终于1925年10月10日正式成立了故宫博物院。作为担任故宫博物院首任院长的易培基刚正不阿，为人正派，守护国宝，尽职尽责，他全力整顿院务，捐资修缮故宫，创办《故宫周刊》等，故宫博物院机构逐步完善，工作走上正轨，一度成为故宫博物院发展的鼎盛时期。这也是易培基个人声望的鼎盛时期。然而，命运多舛。1933年，日军攻陷山海关。国难当头，为了保全国宝，易培基顶住各方压力，力主将故宫文物南迁，使得国宝免受战火荼毒。也正是在易培基组织一批批文物运出北京时，因遭人诬告私占故宫宝物，国宝南运戛然而止，易培基的命运也从此进入了人生的低谷。“七七事变”后，病卧上海的易培基申诉无门，因心中的积怨无处渲泄含恨离世，享年57岁。直到解放以后，经对有关知情者调查核实，这场冤案才真相大白，然而此时的一代文物大师、故宫博物院第一任院长易培基却早已含冤于九泉之下。

营财不为身的“熊老板”——熊瑾玎

“六月二十九日，阴。昨今两日新所长龚心印带了一批人入所。瑾玎向政务厅交涉，借了两千纸洋，决定七月一日移交。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〇〇〇〇〇之招。”

这是1921年6月29日第一师范附属小学教师谢觉哉的一篇日记，他用平淡又琐碎的言语记录了中共一大召开前这段不为人所知的故事，日记中提到的“瑾玎”便是后来为党营财，默默奉献一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熊瑾玎。

透过谢老的日记，让我们把记忆拉回1921年6月底的长沙。夏日蝉鸣聒噪、格外闷热，再过几天毛泽东、何叔衡二人就要代表中国共产党湖南早期组织赶赴上海参加中共一大，但此时他们却因为不够路费前往上海陷入了困境。这时，一位身穿长衫、温文儒雅的中年人形色匆匆地赶来，他正是当时第一师范的庶务主任——熊瑾玎。只见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毛泽东接过打开一看，顿时惊呆了，布包里装有足足两千纸洋，要知道当时长沙一名警察的月薪才六块，这无疑是一笔巨款。原来熊瑾玎在得知二人因为缺少经费可能无法前往上海的消息后，连夜奔波为他们紧急筹集了路费，这下可解了二人的燃眉之急。最终，毛泽东、何叔衡得以顺利从长沙出发奔赴上海参加中共一大会议。

熊瑾玎，1886年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的一个中医世家，10岁时开始在家乡读私塾，后渐渐对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20岁时来到徐特立等人创办的师范速成班学习，他深受徐特立先生的影响，并开始接触到新思想、新文化，对时事政治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

1914年春，熊瑾玎应聘至长沙楚怡小学任教，并开始在湖南通俗教育馆当会计、办报，组织经营销售。就在这一期间，他结识到了当时在第一师范求学的毛泽东、蔡和森等一大批优秀青年，他们经常一起讨论时事、钻研学问，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18年加入新民学会，主要负责学会筹款管理等事项，并于1927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熊瑾玎在党的早期革命活动中一直扮演着“幕后人”的角色，他认为“要做事，就要有钱”，主张创办经济实体。1928年他临危受命开始担任中央机关的会计，负责管理和筹措资金。为掩人耳目，他以商人的身份开了一家布行—“福兴商号”。在

“熊老板”身份的掩饰下，熊瑾玎一次又一次地奔赴在革命的前线，构筑起了一条党内外联络的红色生命线，为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经费保障。

可就是这样一位外人看来风光无限的“熊老板”心中，却埋藏了一份难以言喻的伤痛。那是1940年重庆一个平常的冬夜，熊瑾玎年仅半岁的女儿突发疾病、高烧不止，夫妇二人急忙抱着孩子赶来医院。医生给孩子下达了病危通知书，并开出一张10块大洋的费用单，这却难倒了这对夫妇，谁能想到这位“熊老板”身上仅剩下2块大洋。熊瑾玎望着焦急难安的妻子和怀中双眼紧闭的孩子，手里紧攥着的费用单仿若千金重，压得他喘不过气。夫妇二人在重庆举目无亲,又是深夜，他们抱着孩子在寒风中四处奔波也没能筹到10块大洋。孩子本就瘦小孱弱，更是难以坚持，最终在母亲怀中停止了呼吸。望着妻子怀中那个小小的脸庞，堂堂七尺男儿默默流下了眼泪。

作为父亲，熊瑾玎一生清贫、两袖清风，甚至因为拿不出10块大洋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病死怀中，泪在其眼里，痛在其心中。作为共产党人，他公私分明，为党理财，经手的钱财不计其数，却仍时刻廉洁自省，永葆初心。这就是值得信赖的共产党人！这就是营财不为身的共产党人！

永远的先生——徐特立

20世纪50年代有一首歌家喻户晓：“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它好比大松树冬夏长青，它不怕风吹雨打，它不怕天寒地冻，它不摇也不动，永远挺在山顶……”这首歌热情歌颂了我党历史上许许多多老一辈革命家的非凡人生。

就有这样一位革命家，他57岁高龄坚持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延安时期,党中央一致同意为他破例祝寿，毛主席亲笔书写生日贺信称他是自己“永远的先生”，赞扬他是“坚强的老战士”，评价他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这位先生是谁呢？他就是“延安五老”之一的徐特立先生。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徐特立赢得了党和人民的尊敬与爱戴？连毛主席都要尊称他为永远的先生呢？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追寻徐老足迹，重温他一生的光辉历史。

徐特立，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1877年出生于长沙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青年时代的他怀抱“教育救国”的远大志向，先后创办了梨江高等小学、五美小学等五所小学。又在周南女中、稻田中学、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等学校任教，他把自己的教育救国理想与国家前途命运联系起来，“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毛泽东、田汉等进步青年知识分子都成为了他的学生。

1919年五四运动后，年届42岁的徐特立先生，毅然赴法勤工俭学，苦苦探寻救国救民的道路。回国后继续潜心教育，培养了大批进步学生和优秀教师，他的高尚人格和忧国忧民的情怀对毛泽东、田汉、蔡和森等进步青年产生了深刻影响。

大革命时期，如火如荼的工农运动在南方各省兴起。1926年12月，徐特立与他昔日的学生、回湖南考察农民运动的毛泽东会面，从毛泽东等共产党人身上他看到了国家和民族的希望，更坚定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

1927年大革命失败，全国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徐特立由自己的学生李维汉介绍，毅然决然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用信仰铸就忠诚、用行动诠释初心的共产主义战士。

土地革命时期，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徐特立在苏区创新教育方法，开办了各类学校和培训班。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开始长征，这个时候谁也没有料到，已经57岁高龄的徐特立毅然参加长征，他和普通红军战士一样，爬

雪山过草地，不畏艰难完成了长征壮举。据统计，长征两万五千里，徐老骑马不过两千里，人称“徐老徐老真是好，不骑马儿跟马跑”。他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如同一股暖流温暖着、鼓舞着身边的革命战友。

延安时期，徐特立为边区的教育事业呕心沥血，培养了大批干部人才。1937年在他六十寿辰时，毛主席写祝寿信称他是“永远的先生”，充分肯定了徐老对党和国家革命事业高度负责，对人民无限忠诚热爱的崇高境界和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品质。著名作家丁玲在给徐老的祝寿诗中写道:“长征二万五，衣服自己补，马儿跟着跑，生活最艰苦。闲暇爱读书，年老心不古，遵纪是模范，谦逊与人处。革命主义真，名利当粪土，大家贺徐老，共撰英雄谱。”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强调，我们要深刻铭记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奋斗的百年艰辛历程，发扬为民服务孺子牛、创新发展拓荒牛、艰苦奋斗老黄牛的精神。总书记提出的孺子牛、拓荒牛、老黄牛精神既是对像徐老那样的老一辈革命家光辉一生的真实写照，更是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初心的高度升华。

胸怀千秋伟业，恰是百年风华。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我们每一位共产党人都应向徐老学习，以徐老为榜样，发扬新时代的“三牛精神”，共同汇聚“九牛爬坡，个个出力”的强大合力，为奋斗“十四五”开启新征程贡献自己的力量。只有这样，中国号巨轮才能乘风破浪，驶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袁吉六

1965年春，毛泽东在中南海用辣椒炒肉、豆豉辣椒蒸鱼等家乡菜宴请郭沫若、章士钊、周世钊等党外民主人士。席间，大家因为豆豉辣椒聊到了袁吉六，毛泽东饱含深情地回忆起这一位未能出席宴会的老师。说到这位老师，周世钊脱口而出:"此老通古今文史"郭沫若接腔道:"斯人教天下英才。"毛泽东笑着说:"英才过誉，,但'教天下　倒还是符合袁老先生身份。”

袁吉六,榜名仲谦,派名士策。同治七年(168年)生于湘西保靖县袁家坪,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中丁酉科举人，一生矢志教育，不入仕途，在一师期间.,他曾担任青年毛泽东的国文教师达五年半之久,对毛泽东一生影响巨大。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袁吉六从小家庭困难,不负老师教诲。中午，别的学生都回家吃中饭了，就他一个人留在学校读书写字。到了晚上，他先是帮父亲做完家务,再点起一盏桐油灯刻苦学习。因为学习十分用功，不久就初步掌握了诗词歌赋的要领。为了使他得到进一步的培养,父亲的好友，苗族举人石明山又将他推荐到古丈县名师许光治先生家寄住深造。

两年后，袁吉六回到葫芦寨，一边教书，一边自学，准备参加科举考试。

光绪年间，永顺府督考秀才，袁吉六闻讯，又喜又忧，喜的是有机会得以展现生手，忧的是家穷路远。最后，他只能到左邻右舍借了些粮食，熬成锅粑，当做赶考的干粮。

因为旧时考试时间较长，为了避免考试中途饥渴难耐，所以考试那天，袁吉六事先将几块锅粑塞进袖筒里，以备饥饿时用来充饥。等进考场搜身时，监考官见他袖筒里藏有东西，怀疑他是夹带作弊，便责令他接受检查。谁料他抖了抖，竟是掉落了一堆黑锅巴，监考官暗表同情，默默走开了。

考试放榜，袁吉六喜中秀才，并从此获得了“锅粑秀才”这个外号。

1913年春，省立第四师范创立，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该校，声名在外的袁吉六也于此时在老乡陈润霖的邀请下出任第四师范国文教师，1914年春，四师范并入一师。袁吉六任然担任毛泽东所在的八班国文教员，袁老教授毛泽东国文长达5年半的时间，对毛泽东的古文学习影响很大。在斯诺《西行漫记》中记录了毛泽东的一段

回忆：“他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半通不通，我只得改变文风。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体。所以多亏袁大胡子。”少年时的毛泽东，文思敏捷、才华横溢，深受袁吉六喜欢。但在为文风格上二人却分歧甚大。毛泽东喜欢的是梁启超写的新闻体，而袁吉六最讨厌的偏偏就是这梁启超。他觉得梁不过一空头大话专家，知一言十，叽里呱啦，要文采没文采，要内容没内容。两人不打不相识，经此一事，师生二人彼此更加了解，袁吉六愈加喜欢毛泽东，毛泽东则愈加敬重袁吉六。袁吉六告诉毛泽东“作文之道,首应务本”并给他开了一串书单，其中以经典的唐宋八大家文章和桐城派古文为多。当发现毛泽东购买的《韩昌黎全集》错讹百出时，袁吉六又主动将自己批校的善本《韩昌黎全集》借给毛泽东。据袁吉六之子袁诚说，1949年其在家中翻阅旧书时仍不时能见毛泽东当年借书的小条子。

晚年的袁吉六，不顾年老体弱，依然坚持写作，留有《文字源流》、《文学史》、《文学要略》、《书法必览》、《分类文法》等著作，后来袁吉六逝世，由于各种原因没有立碑，毛主席得知这一情况还亲自为其题写碑名，据说，这也是毛主席一生唯一为人题写的碑名，由此也可知师生二人感情之笃。

张干

1950年10月1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举行家宴，招待他青年时代敬重的师长徐特立、谢觉哉、熊瑾玎、王季范和受邀专程从长沙来北京相聚的八班老同学周世钊等。师生开怀畅叙，一起回忆起在第一师范的学习、工作岁月。交谈中，毛泽东关切地向周世钊打听起张干来。他问道“我们的老校长张干先生还健在吗？”周世钊回答道“在，他一直在教书，现在在妙高峰中学教数学……”听说张干一直在教书，毛泽东很受感动。情不自禁地说：“张干这个人很有能力，三十几岁就当了一师的校长，不简单，原来我估计他要向上爬，结果没有。解放前吃粉笔灰，现在还在吃粉灰，难能可贵！现在看起来，当时赶走他没有多大的必要，多读半年书有什么不好”。

毛主席说的这位“难能可贵”的教书先生，就是主席读书时曾任湖南一师的校长的张干，主席的这段话又有什么渊源呢？

张干，名攸凰，字次伦，湖南新邵县坪上乡人，1884年出生。小时候家境贫寒，他10岁丧父，依靠长兄卖豆腐为生，靠半工半读完成学业。他学习非常刻苦，经常一灯如豆，伴他苦读到深夜。他为防自己倦极入睡，就用纸条点上暗火，系在手指上，这样一旦入睡，纸条就会烧着手指痛醒，他又可以继续读书。当时的坪上乡流传着一句话：“苦读如张干，何愁不成才！”张干自己也有一首诗回忆当年苦读的情况：“回忆孤儿苦学时，负薪挂角古人师”。张干苦学成才的故事，至今仍为坪上乡里乡亲教育子女的好教材。

1905年，张干考入湖南省中路师范学堂，1911年以第三名的好成绩毕业并奖授举人称号，他也因此留校任教。1912年，中路师范学堂改为湖南公立一师，张干出任首届校长。他治校严，校风好。聘任徐特立、杨昌济、黎锦熙、王季范等名师主教。首创《一师一览》公报，将学校的一切规章制度及办学情况与经济开支，编印成册，公诸于世，这相当于最早的校务公开。

1913年春，年仅20岁的毛泽东自愿报考湖南公立第四师范，第二年，省立四师并入第一师范。毛泽东也随校来到第一师范就读。

1915年的6月，第一师范马上就要放暑假了。就在这时，校门口却贴出了一张告示，内容是说省议会颁布了一项新的规定：从下学期秋季开学开始，每一位学生须缴纳10元的学杂费。一师作为一个的师范学校，本来学杂费是免收的。此时突然告知要

加收学杂费，肯定会引起同学们的不满，何况在那个年代，10元钱对于一个穷学生而言是一笔非常可观的数字，更不要说一师多是一些家境贫寒的穷孩子。因此公告一贴出，便遭到学生们强烈反对，尤其是像毛泽东那样从四师预科转过来的学生，他们的意见就更大，因为当时一师是秋季招生，四师是春季招生，四师合过来的同学来一师后还要多读半年书，这也意味着他们得多掏半年的学杂费。这时有人透露，这个所谓的“规定”是校长张干为了讨好当局而向省政府提出的建议。

于是学生们在校内外大量散发传单，揭露张干校长的所谓不忠、不孝、不仁、不悌等种种“劣迹”。毛泽东看了同学们的传单，则不以为然，认为觉得没有切中要害。他心平气和的对大家说，我们反对张干不是反对他没有当好家长，是反对他没有当好校长。大家一直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在大家的要求下，毛泽东联合了17位同学，重新起草了一份《驱张宣言》，措辞严厉，历数校长张干“办学无能”“贻误青年”对上迎奉，对下专横等等，并连夜派人赶印出来，次日清晨带回学校，且广为散发，震动校园，同学们纷纷罢课，要求赶走张干校长。

此事很快便传遍了省城。张干一怒之下要开除以毛泽东为首的17名闹事的学生。后经杨昌济、王季范、徐特立等老师努力，张干被迫取消成命。但一师的学生并不罢休，继续发动罢课，提出“张干一日不出校门，我们一日不上课”。在强大的压力之下，张干于当年7月被迫辞职，怅然离开了任教6年的湖南一师。

1918年6月，毛泽东从湖南一师毕业后，为改天换地走南闯北，与张干失去联系。

被免职后，张干先后担任了省教育司的督学、湖南省立第五中学、第六中学校长。在六中校长任职期间，抗战爆发，张干提出培养学生“爱国家爱民族之信心，实践勤劳节俭之生活，启发互助服务之精神，俾成为文武合一之人才，以备抗战建国之用”的办学宗旨。1943年，日军进犯邵阳前夕，为了保护学生，张干毅然将省立六中迁往他的家乡黄土坳，历尽艰辛。1944年4月，日军进犯黄土坳，他又果断地疏散学生，保护了学校。张干的女儿张竹如是从延安抗大学习后回湘从事地下工作的党员，他曾多方暗中掩护。六中职员钟景道，也是中共党员，国民党反动当局准备对他下毒手，张干得知后，立刻写信暗示说：“此间对弟亦有流言，下期是否仍来校工作，请酌免于受难。（这一段我没有史料）

1945年，国共谈判前夕，张干致电毛泽东，要求“应召赴渝，幸勿固执”。解放前夕他将自己所有的积蓄变卖成田产，将自己买成了一个地主，成了共产党革命的

对象。

1949年8月，长沙和平解放，张干想起上述事情，特别当年要开除毛泽东的事，就惶惶不可终日。当时生活困顿，有时竟无米下锅，他想给毛泽东写信，又无从提笔。

当毛泽东在家宴上从周世钊口中了解到张干一家六口的生活窘况和愁苦心境后，毛主席立刻不假思索地说：张干应该照顾，应该照顾！并托周世钊带走300万元（旧币）生活费，以表慰问。

1950年10月11日，毛泽东亲笔致函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王首道，说张干、罗元坤两先生是湖南教育界老人，一生教书未做坏事，应予津贴养老，并请派人予以慰问。不久，湖南省政府先后两次以1200斤救济米及50万人民币（旧币）送到张干家。

张干感激万分，夜不成寐。灯下，握笔含泪给毛主席写信。“润之吾弟主席惠鉴：敬启者，……深感吾弟关怀干的生活，（弟）经国万机，不遗在远，其感激曷可言喻？”

接信第二天，毛泽东就亲自给张干回了信，言对张干的生活困难“极为系念”，这一语牵心动肠，力重千钧，让张干老泪纵横。张干欢欣鼓舞，以他的学生中出了这样一位伟人而倍感欣慰。

1952年秋，张干等应毛主席之邀赴京叙旧。9月26日上午，毛泽东请张干等到中南海家里一起吃饭。老师到来时，他已亲自站在门口等候。汽车一停下，他就走上前去为老师开车门，还用手挡住车门上方，生怕老师碰了头，然后扶着老师下车。张干见毛泽东如此恭敬对自己，更加惭愧不已，眼里噙满泪水，将憋在心里的许久的话终于向毛泽东吐了出来，“润之，一师闹学潮那阵，我主张开除你，真对不起呀”毛泽东摆了摆手，打断张先生的话，说：我那时年轻，虎气太重，看问题片面，要请先生原谅，……，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它了”接着引用古诗：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我这颗寸草怎么也难报答老师的“三春晖”啊。饭后，主席陪他们参观中南海，看电影。几天后，毛主席派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来为张干等人检查身体。

不久张干回到湖南受聘为省军政委员会参议室参议、省政府参事室顾问。每月领取的聘金，加上学校的薪水，使一家生活有了保障。他常参议国家大事，应邀作报告，深为人敬重。之后师生之间多次书信往来，毛泽东还帮助张干将女儿调到身边工作。

1963年5月，毛泽东得知张干病重的消息，他心急如焚，26日，毛泽东亲笔给张干写信问候：

次伦先生左右：

两次惠书，均已收读，甚为感谢。尊恙情况，周惇元兄业已见告，极为怀念。寄上薄物若干，以为医药之助，尚望收纳为幸。

敬颂早日康复。

毛泽东

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六日

信是托当时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捎到长沙的，随信一起到张干手里的除珍贵药品外还有现金2000人民币。张干久久捧着毛主席的来信，眼泪纵横。

1967年1月2日，张干因病在长沙世逝，享年83岁。临终前，他念念不忘毛泽东的宽广胸怀和对他一家重如泰山的恩情，并再三叮嘱自己的子女要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他博大的心襟，处世待人要正直，要有一技之长，要报效国家。这倾吐了老一辈知识分子对毛泽东无限热爱的心声。

张干先生一生坚守教育事业，是值得敬重的优秀知识分子，他与和毛主席的师生情谊书更是书写了一段教育史上的佳话，特别是毛泽东尊师重教的崇高风范更是需要我们传承和发扬的宝贵精神财富。

知人善教的好老师——王立庵

1950年7月23日，一封印有“中央人民政府人民军事委员会”的专用信封从北京中南海寄到了江苏无锡师范附属小学。这座远在江南的小城校园顿时沸腾了，收信人更是手捧着信件，留下了激动的泪水，觉得重如千钧。

此时，她与寄信人素未谋面。

作为有八个孩子的单亲母亲，她没有想到在生活困难、走投无路时写去的一封求助信能这么快就有了回信；她更万万没有想到，十年后，她受到寄信人的隆重邀约，赴上海见了面还合照了一张相。这位寄信人和收信人他们是什么关系呢？

事情还得先从一个人说起，那就是——王立庵。

王立庵，湖南浏阳人，数学教育专家。自幼进私塾读书，数学科毕业后在湖南高等学堂、湖南陆军学校等校任教。1913年至1920年，王立庵来到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任数学教员，与正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的毛泽东相识。

当时，21岁的毛泽东以作文满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学校，入学后更以勤奋刻苦、聪明好学、志向远大，迅速成为学校青年才俊中的佼佼者，是妥妥的“学霸”一枚，深受老师们的喜爱。特别是袁仲谦、杨昌济等老师，更是对他赞不绝口。而作为数学老师的王立庵，看着毛泽东的数学成绩，着实称赞不起来了。

原来，毛泽东从少年时开始就喜爱读书，尤其偏爱文史哲，对学习数学“很不用心”，经常请假不来上数学课，或者来了就在数学课上看国文书籍，数学成绩怎么能好呢？

一般对于偏科的学生老师都会要求学生不能偏科，有时间会格外抽空让学生去补学偏科的那一门。王立庵老师也一样，只不过他是一位非常惜才，宽厚细心、擅于循循善诱的好老师。多年后，毛泽东回忆起王立庵说：

“当时我喜欢读古文，而不爱数学，但立庵先生并不因此歧视我。”

原来，王老师私下观察了毛泽东这个不喜欢数学的学生一段时间，对他异于常人的才华胆识、勤奋刻苦的求学精神和活跃开阔的思想能力都非常欣赏。经过一段时间的默默关注后，王立庵老师决定好好开导教育毛泽东这个好苗子。恰好，又逢毛泽东没来上数学课，他的好友周士钊捎来病假条；王立庵便在隔天，找到毛泽东，让他星

期天到自己家中来，要与他“谈话”。

作为学生，毛泽东心里肯定是忐忑不安的。试想，作为一个数学偏科的学生，收到数学老师的邀请，心里怎能不打鼓，怎能不怕挨批评呢？

星期天，毛泽东惴惴不安的准时赴约，来到王立庵家中。

王立庵带他到书房，毛泽东见数学老师的书房里摆满了书。这些书，不局限于数理化方面，还有非常多的文史类书籍，甚至有很多偏门的古籍和外文学术资料，立即对这个眼前这位通晓古今，博学多才的数学老师肃然起敬。

王立庵温和地询问毛泽东，为什么不喜欢数学；毛泽东诚实地将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原来，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毛泽东认为，国家振兴必须从转变国人思想入手，只有社会科学可以做到，像哲学、历史、国文等，都是改造国民思想的重要武器。而其他学科就略逊一筹，起不到什么大作用。毛泽东年纪轻轻，却能从国家大背景出发，从国家建设的重点入手，这样胸怀天下、睿智过人的思维，让王立庵暗暗佩服。此时，他已经不是站在老师的权威角度，而是站在朋友知己的立场，将自己的知识所学，推心置腹地告诉了毛泽东。

王立庵对毛泽东说，学习社会科学固然重要，但自然科学的课程也不能荒废。他也从当时的社会背景入手，耐心地向毛泽东解释起来。在王立庵先生循循善诱的教导下，毛泽东明白了数学老师的良苦用心，也看到了自己想法上的不足和偏差；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将自己偏废的数理化知识迅速补习上来。王立庵看到这位聪慧的学生如此上进好学，当然喜不自禁。因为毛泽东住所学习不便，他就主动邀请毛泽东来他家中补习。1915年整个暑假期间，毛泽东每个上午都到“李氏芋园”王立庵家里，聆听王立庵讲授数学课，中午便在他家中吃饭。

在王立庵老师的一片拳拳爱护之心下，毛泽东落下的数学课很快补了上去。这一次的补课经历，毛泽东后来回忆的时候，仍旧满是感动，说：王立庵先生是湖南教育界的知名人士，他是我的数学老师，在他的教育下，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古人云，“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

的确，作为老师给学生传授道理、解答疑惑；但有一些特别优秀的教育工作者，不仅做到了传道、授业、解惑这些基本的老师职责，还与学生像朋友、像父子一般相处，彼此理解、彼此尊重、彼此平等，更难能可贵的是彼此学习，师生关系融洽，成为了真正的“良师益友”。

王立庵老师和学生毛泽东就是这样的“良师益友”。

1920年7月，已毕业的毛泽东踏入社会筹办文化书社，面临资金短缺的困难，王立庵知悉后，立即和王季范等老师帮忙集资，最后筹到500元，支持学生的事业。

当然，毛泽东也没有让老师失望。为了实现自己救国救民的远大抱负，走上了艰辛危险又波澜壮阔的革命之路。之后，危机四伏与忙碌繁重的事业，让毛泽东渐渐与王立庵断了联系。

1926年王立庵老师病逝。逝世前，他还一直向家人多次提起毛泽东，深深牵挂惦念着那个好学不倦，才华横溢的“偏科”学生。而毛泽东从来也没有忘记王立庵这位恩师；在延安与昔日同窗好友萧三叙旧，他满怀激动地谈到了自己到王立庵先生家中补习数学的事。一再对萧三称赞王立庵老师是个“明白人”，是个“知人善任的好老师”，是个“好人”。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方打听王立庵老师一家人的消息。直到1950年，收到一封来自无锡的信件，这封信的寄信人“吴启瑞”是王立庵老师的儿媳。原来，当时她的丈夫王人路已去世，一个女人要养育8个孩子，生活困难可想而知。在孩子的学校问题上，实在没有办法，走投无路，无奈只好尝试着给丈夫当年一直称呼的 “毛大哥“写去了求助信。没想到，她的求助不仅很快得到了回应和解决，还得到了毛主席的亲笔回复。

这就是文章开头的一幕。

1960年6月，因为公事毛泽东来到上海，他忆及恩师王立庵，一时感慨，便想亲自接见吴启瑞，了解恩师后辈的生活情况。当吴启瑞看到忽然来接她去上海的政府人员，吃惊极了，也激动高兴极了。他们一起聊以往的事，谈到恩师王立庵，毛泽东感慨道：

“记得立庵先生的生辰是1867年8月19日，算来当时再过6天，先生便可享六十大寿了！“…… “兹人不得见，惆怅无已时。”一旁的吴启瑞，听到此处热泪滚滚而落。她哽咽的说：

“人路啊，人路，你的遗愿实现了，毛大哥一直无微不至的关怀着我们。”

毛泽东真是时刻都没有忘记老师对他的恩情。

这一天，毛泽东详细询问了吴启瑞的家庭住房和经济条件，并将自己的300元稿费赠予吴启瑞补贴家用。临别时，毛泽东与吴启瑞合影留念，还一直将吴启瑞送到门

口，继续嘱咐她要为了8个孩子多保重。

这些关怀，对吴启瑞来说，比冬日暖阳还要温暖。几年后，吴启瑞的几个孩子都走上了工作岗位，8个孩子中，有7个都接受了高等教育，成为了国家栋梁之材。他们的出色成就，不仅是对于他们的爷爷王立庵在天之灵的告慰，同时，也是对屡次帮扶他们一把，帮助他们渡过难关的毛主席的最好回报。

教师是铸造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一代伟人对一位老师滴水之恩则涌泉相报的胸怀令人感动！

毛泽东早期在一师实践（活动）系列

1、一师“学潮”

2、游学（农村调查）

3、主持学友会

4、主办工人夜学

5、猴子石缴枪

6、发起成立新民学会

7、附小主事

8、……

毛泽东早期在一师的诗词（书信、重要文稿、文献）系列

1、诗词系列……

2、重要文稿、文献系列

1）、《讲堂录》

2）、《伦理学原理》批注

3）、《征友启示》

4）、《湘江评论》创刊宣言:民众大联合

5）、1917年一师《人物互选》

6）、《夜学日志》

7）、《新青年》（《体育之研究》）

8）、《衣服》教案

9）、1916年与萧子升信

10）、1917年与黎锦熙信

……

毛泽东在一师学习系列

1、体育（锻炼身体、磨练意志）

2、读书（科学的学习方法）

3、阅报（密切关注时事）

4、……

毛泽东在一师立志（确立信仰）系列

1、改造中国与世界

2、毛泽东与五四运动

3、毛泽东与驱张运动

4、毛泽东与工读新村

5、毛泽东与文化书社

6、毛泽东与湖南俄罗斯研究会

7、毛泽东与湖南自治

7、毛泽东与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及建党

8、毛泽东与湖南自修大学

周谷城

1898年，周谷城出生于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欧江岔镇长东湖村，益阳著名“三周”之一（周扬、周立波、周谷城），是我国近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农工党中央主席。他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七十多年，研究领域十分宽广，对史学研究尤深，他一人撰写了中国通史、世界通史两部宏篇巨制，其史学成就至今在史学界仍广为传颂。不仅如此,其研究领域，还涉及教育学、政治学、社会学、美学、经济学等诸多学科，同样.硕果累累。他学贯中西，严谨治学，学识渊博，自创新说，成一家之言。

青年时期周谷城在湖南长沙省立第一中学中学读了4年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那时他已经系统地读了《史记》《汉书》《国语》等古籍，写作时喜欢引经据典，阐述道理。国文老师袁吉六后来说：“我在第一师范教书时，古文最好的学生是毛泽东；在省立一中教书时，古文最好的是周谷城。”

1917年，周谷城考入了北京高等师范，“在当时，高等师范不是大学，比大学要低一点，毕业出来只能教初级中学，我开始是不想考这所学校的，我想考北京大学。我想学致治，不想学师范，但我没有钱。而师范不同，吃饭不要钱，穿衣不要钱，买书也不要钱，进师范太好了。”周谷城回忆道

考试的时候，周谷城的运气不好,很“背时”。北京高等师范在湖南只招收6名学生，而报名的有150多名，在报名之后，周粗略的估算了一下报考人数，大概一个人拼掉二三十人才有可能入校读书，认为自己还是很有把握的，但结果不好，在6名正取之外，列为备取。虽被列为备取，但周坚信“骄傲使人落后，失败是成功之母”，当时可以说是失败了，但他也知道自己与正取考生的实力相当，所差无几，所以拼了命也要进入复试的名单之中，于是和同被列为备取考生的人一块到当时的教育厅去争取，居然当局也被说服了，但必须要自费去，而正取考生是由教育厅提供路费。到北京之后，6名正取考生得意洋洋，他们认为，省城已经考试过了，到北京不过是做做样子，所以就掉以轻心，草草应对。相反，周谷城与他们所差无几的另外两名备取考生，拼命努力，争取最后的机会，认真复习功课，复考的时候，相当认真负责。最后6名正取掉了3个，3个备取都补上去了，而且补位也很前列。当时他们几个人兴奋极了。

甫入大学，即逢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五四运动。 1921年，周谷城离北京高师毕业还差半年，便回到湖南长沙，在第一师范执教英语和论理课了。当时，毛泽东正在一师附小任主事。一见之下，引为知己。

1921年春，周谷城和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相识，至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其交往的时间长达半个多世纪，彼此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新中国成立不久后，有一次毛泽东到上海视察，邀周谷城相见，当时上海市许建国副市长等也在座。落座后，毛泽东对许建国等人说：“周谷城是我的老朋友,我认识他比你们还早得多。”

周谷城赶紧申明：“许副市长，我是个不争气的人。我怕死。”听了这话，毛泽东不以为然，摇手说：“不要紧,没有人怪你。”

其实周谷城所说的“怕死”是指大革命后,他“躲”到上海译书、卖文的那段经历。其实，这段经历并不能说明他“怕死”。

青年周谷城，是一位热血青年。他参加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参加了北京学生集会、火烧赵家楼。还曾骑着毛驴，带着留声机到京郊宣传“五四”精神。即使在大革命失败后，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统治时期，周谷城都没有因为“淫威”所屈服。1948年，蒋介石集团镇压“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民主运动时，周谷城就与翦伯赞等挺身而出，起草发表了很多反对国民的宣言。当即周谷城等人就被国民党抓捕了。直到1949年5月26日上海解放,周谷城才被释放。由此可见,周谷城始终是一个正义感很强的人。

解放后，毛泽东与周谷城的交往一直很好，用周谷城自己的话说：“几十年来，没有半点隔阂。”毛泽东每次来上海，都要约见周谷城。而周谷城每次去北京，也常被请到中南海。领袖和学者，海阔天空，促膝长谈。与毛泽东个人接触能这样频繁的学者,在全国是很少见的。


HUNAN FIRST NORMAL UNIVERSITY
1903